論　著

政黨宣傳與婦女服務：1950 年代臺灣婦女宣傳網的制度運作與在地實踐 *

藍　暄　侑 **

摘　要

* 本文增訂自筆者碩士論文〈1950 年代臺灣婦女宣傳工作〉（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 年 7 月）之部分章節。本文承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碩士論文獎」支持，並感謝林果顯、游鑑明、薛化元、莊勝全等師長之指導與建議，以及本刊匿名審查人與編委會之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25 年 12 月 24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6 年 3 月 17 日。

**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校史與檔案組計畫專任助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文探討 1950 年代國民黨婦工會在臺灣建構的「婦女宣傳網」，從制度運作與在地實踐出發，分析其於黨國體制、父權社會與基層女性日常間所形成的多重意義。相較於既有研究著重婦女組織的政治論述與宣傳成果，本文聚焦宣傳網的組織模式、工作流程與性別化運作邏輯，指出其如何在反共主義與「宣傳下鄉」政策下，將政治宣傳生活化地滲透家庭與社區，並在資源匱乏與體制鬆散中，仰賴地方女性的自主參與、私人網絡與母職形象，宣導黨國與家政知識，形成兼具政治性與實用性的婦女宣傳工作模式。

本文運用國民黨黨務文書、報刊、黨工投稿、教材及口述史料重建宣傳網的制度與運作實情。研究發現，宣傳網既是黨國滲透全臺的政治工具，也是女性進入公領域的重要管道；地方輔選與八七水災等案例顯示其強化國民黨基層支持、濟弱扶貧與女性互助的社區功能，形塑「婦女票」的臺式選舉動員文化，卻也再製女性身體表演、無償服務與母職情感等性別定位。

整體而言，婦女宣傳網結合義務幹事制度，旨在統合婦女，形塑黨國宣傳深入臺灣的關鍵機制，亦揭示女性在黨國與父權縫隙間所展現的能動性與限制，構成冷戰臺灣國家、性別與地方社會互動的歷史場景。

關鍵詞：國民黨婦工會、婦女宣傳網、婦女義務幹事、政治宣傳、社區服務

前言

> 搶攻婦女票，國民黨擬就南北、城鄉差異，擬訂不同戰略，同時把馬政府政績「口語化」、「生活化」，透過婆婆媽媽菜市場部隊，傳遞到基層。……國民黨婦女部主任、台北市議員陳玉梅指出，婦聯會及隸屬國民黨各縣市黨部下的婦工會，以及各縣市婦女會等民間社團，長期以來是國民黨重要票源。[1]

以上摘自 2011 年臺北《聯合晚報》對時任國民黨婦女部主任陳玉梅（1966-2017）的採訪。國民黨傳統上深耕「婦女票」與老牌婦女團體，並強調「過去國民黨婦女工作著重組織聯誼」的輔選特色。此一說法顯示，國民黨在選舉動員中所倚賴的婦女網絡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因此，當代臺灣此類結合婦女聯誼網絡、組織輔選與女性化政治宣傳的動員模式，其形成的歷史脈絡爲何，正是本文欲探討的重要問題。

1950 年代，臺海兩岸分治的首個十年，國民黨政府爲反共復國，穩定臺灣治理，致力於建立黨國體制以及對各族群、階層與團體的宣傳政策與戰爭動員。[2] 臺灣婦女界亦由國民黨中央婦女工作會（今已裁併，下稱婦工會）領銜，與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今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下稱婦聯會）及臺灣省婦女會（今中華民國婦女會，下稱省婦女會）形成三大婦女團體共治局面。政府藉此對廣大婦女展開宣

1 〈面對女對手？藍婆婆媽媽部隊備戰〉，《聯合晚報》（臺北），2011 年 4 月 17 日，A2 版。

2 林果顯，〈戰後台灣的戰時體制（1947-1991）〉，《臺灣風物》，卷 58 期 3 （2008 年 6 月），頁 135-166。

傳，自上而下領導婦女齊家報國的工作，訴求婦女們穩定家庭社會與性別秩序，更要她們爲社區與軍隊供應家務服務與後勤勞動。[3] 爲求行文簡潔，本文將此種具有官方色彩的宣傳工作稱爲「婦女宣傳工作」，兼以呈現國民黨高度統制臺灣婦女界的時代特色與歷史事實。[4]

作爲 1950 年代臺灣婦女界的領導機構，婦工會成立於 1953 年，由宋美齡（1898-2003）指導，並由婦女菁英李秀芬（1910-1985）與錢劍秋（1904-1996）先後擔任主任，錢劍秋更長年主持婦工會的行政運作。[5] 婦工會下設專責宣傳工作的第四室，由女作家王文漪（1914-1997）受聘爲總幹事，實際主持黨營婦女雜誌《婦友》並辦理宣傳活動。[6] 既有專

---

3 游鑑明，〈臺灣地區的婦運〉，收入陳三井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2000），頁 488-490。

4 1950 年代的臺灣婦女界，除了親近官方、較具政治性的婦女組織外，亦有臺灣省保護養女運動委員會、中華民國女童軍總會、基督教女青年會、臺灣省護士公會、臺灣省助產士公會等多元發展、性質各異的婦女組織，並在不同領域服務女性群體，自然亦有配合組織宗旨的宣傳工作，其貢獻同樣不容忽視。惟本文關注國民黨的政治宣傳，這些較不具政治性的婦女宣傳工作則暫不納入本文「婦女宣傳工作」的討論範疇。有關當時臺灣的婦女組織概況，請見游鑑明，〈臺灣地區的婦運〉，收入《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 475-477。

5 錢劍秋，號嘯辰，江蘇鎮江人，長於上海，美國西北大學法學博士。中日戰前曾任律師與法學教授，戰時投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與對日敵後工作，戰後則任職於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並當選首居立法委員。1949 年來臺後，錢氏受宋美齡器重，常任婦工會第二任主任（任期：1954-1988），長年主責戰後臺灣婦女動員，為黨國時代婦女界的關鍵人物。有關其生平，請見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新北：國史館，1998），第十七輯，頁 538-540。

6 王文漪，江西江都人，金陵大學畢業，名將王柏齡（1889-1942）之女。中日戰時，曾任外交部駐滇辦事處，並於昆明及東南亞相繼從事報刊與僑務工作。1949 年後來臺，歷任國防部總政治部《軍中文藝》主

攻知識婦女的文字宣傳，也有走入基層的口頭宣傳，1955 年由婦工會首創不必支薪的「雙重義務制度」，[7] 旨在透過婦女宣傳網（亦稱婦工宣傳網），[8] 搭配服務性的婦女義務幹事制度，雙管齊下地布建黨國體制內的婦女宣傳政策，打造由上而下走入基層、更進一步走向家庭的標誌性工作，以求爲當局達成「宣傳到家」的效果。[9]

事實上，1950 年代國民黨政府在反思敗退臺灣的原因時，認爲宣傳不及中共是致命弱點，特別在農村基層更顯薄弱。[10] 中樞遷臺後，國民黨遂推行以「宣傳下鄉」爲核心的

編；1954 年入主婦工會第四室，創辦《婦友》，長期主持婦女宣傳工作，1976 年後以兼任委員身分持續服務。有關其生平，請見王文漪口述，樸月專訪，〈幽蘭勁竹寫平生：訪王文漪先生〉，《文訊》，期 30（1987 年 6 月），頁 176-187。

7 「雙重義務制度」為本文所使用的分析性用語，並非當時的正式名稱。由於在既有開放檔案中尚難找到能同時涵蓋婦工會基層兩項制度的適切用語，本文遂創用此詞以凸顯其性質上的相似性與功能上的並行性，便於後續論述。

8 「婦女宣傳網」一詞早於 1955 年的「黨中央工作檢討結論」即已出現，且錢劍秋也在 1955 年 9 月的會內信提到她已函請省縣市黨部「組織各地宣傳網」，且有部分縣市黨部完成宣傳員聘任名單的報會手續，但翻閱婦工會 10 週年的成果報告，卻指出「婦工宣傳網」是起於 1957 年，追究二者內容卻不見差異，囿於婦工會檔案取得受限，本文傾向推斷 1955 年為開創年代，1957 年為正式列入書面規定者。參考自「中委會四十四年度上半年度工作檢討結論」，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號會 7.1/78；錢劍秋，《經驗的歷程：致婦工同志的六十封信》（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61），頁 8-9；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工十年》（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63），頁 89。

9 婦友社編，《自由中國的婦女》（臺北：婦友社，1957），頁 40。

10 余敏玲，〈導論：同中有異的兩岸黨國體制〉，收入余敏玲主編，《兩岸分治：學術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1945-200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 14。

政策，企圖強化中央宣傳體系的向下滲透，縮減與地方間的落差。[11] 婦女宣傳網循此脈絡而生，並藉由動員基層婦女將政治訊息融入家庭生活，宣傳到家，塑造有利於國民黨的社會氛圍。學者林果顯指出：國民黨在反共宣傳的在地化過程中，試圖突破僵硬的政宣形象，以生活化的方式親近民眾，體現「政治生活化」與「宣傳下鄉」的政策精神。[12] 因此，本文從「宣傳下鄉」政策下的婦女宣傳網出發，探討基層女性如何透過情感聯繫、人際網絡與日常實踐，在公私交錯的生活領域中貫徹官方的宣傳政策，進而揭示 1950 年代政治宣傳親近家庭、深入社會的性別化途徑。

隨著 1950 年代臺灣開放地方普選後，[13] 婦女宣傳網兼具政黨機構與基層網絡的雙重身分，在反共國策的最高原則下，也在各地協助國民黨贏得選舉、推行政令，並發展帶有婦女色彩的社區服務，有助於形塑本文開頭引述的「婦女票」文化。

這種以政治宣傳爲本，兼及賢妻良母式社區工作的女性

11 「宣傳下鄉」的具體作為有巡迴宣傳箱、反共抗俄宣傳列車與巡迴文化工作隊的地方建置，一方面傳達政令至非都會區的鄉村與山地，一方面亦同時蒐集地方政情，以達有效並確實的全臺控制。參考自林果顯，〈一九五〇年代反攻大陸宣傳體制的形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 年 4 月），頁 93。

12 林果顯，〈一九五〇年代反攻大陸宣傳體制的形成〉，頁 164。

13 1949 年國民黨政府在臺灣啟動政治改革與地方自治，並首開縣市議員與縣市長的普選，1951 年則開放省議員的普選。縱然選制與任期時有修正，但此類定期性的地方選舉慣例則自 1950 年代延續至今。面對定期改選的壓力，學者若林正丈以「二重侍從主義」點出國民黨與地方派系「控制卻又依存」的關係，更指出各地臺籍菁英作為黨國與臺灣民眾的媒介事實。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新自然主義，2004），頁 139。

動員，也反映同期國際反共陣營共通的父權特質：冷戰時期的美國在鼓勵女性回歸家庭時，也動員她們參與弘揚美式價值的地方組織，進而守護社區免於赤化。[14] 從此一比較視野出發，本文關注婦女宣傳網如何在政治宣傳與服務工作的結合中體現「以服務代替宣傳」的策略。[15] 同時，本文也延續學者任育德對 1950 年代國民黨婦女工作與選舉動員的初步觀察，[16] 進一步闡述婦女宣傳網在黨國宣傳工作性別化與在地化的關鍵角色。

有關 1950 年代婦工會宣傳處室與服務機構的研究，以學者游鑑明最具代表性。她先以婦工會刊《婦友》爲核心，分析其知識生產與流通脈絡，論述自 1953 年婦工會成立以來在文宣體系中的角色與影響。[17] 此後，她更進一步以「婦女之家」爲例，探討婦工會在基層推展醫療衛生、社會救濟

---

14 Diana Cucuz, *Winning Women's Hearts and Minds: Selling Cold War Culture in the US and the USSR* (Toronto, Buffalo &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23), p. 10.

15 「以服務代替宣傳」是婦工會對婦女宣傳網人員的訓練內容之一，請見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黨員集訓教材》（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58），頁 77-80。

16 學者任育德在其出版前的博士論文曾略微論及 1950 年代國民黨與婦女團體的特殊淵源，同時也注意到 1950 年代國民黨為婦女工作設立專組專會的優待，以及各地婦女組織菁英強大的選舉動員能力，但並未有延伸討論，也未收錄至其出版後的同名專著，乃至於其輔選研究的相關專文。請見任育德，〈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5 年 2 月），頁 270；輔選研究之專文則請見任育德，〈中國國民黨輔選動員機制之建立及其發展（1950-196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25（2006 年 5 月），頁 71-116。

17 游鑑明，〈是為黨國抑或是婦女？1950 年代的《婦友》月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9（2011 年 12 月），頁 75-130。

與家政指導等工作，以及婦女義務幹事在「婦女之家」的運作實況。[18] 綜合而言，游鑑明不僅個別開啓婦工會內部制度與在地實踐的兩條分析路徑，亦揭示該會身爲黨政機構與女性組織的雙重性格。

然而，就宣傳而言，游氏以《婦友》爲研究對象，主要還是聚焦婦工會的文字宣傳與雜誌出版，如何運用機構組織層層動員並建立基層婦女的宣傳網絡，非其論文主題。本文嘗試承接討論，並進一步探討 1950 年代婦工會自文宣走向基層後首創的「婦女宣傳網」，以揭示其制度建構與實踐運作的歷史特質及性別意義。

綜合以上討論，本文關注的是：1950 年代國民黨對主導臺灣婦女界的婦工會與其基層組織是否重視與投入？再者，標榜針對草根婦女的婦女宣傳網，其基層建設與工作內容體現什麼樣的政治需求與性別意識形態？同時，其對臺灣社會與各地婦女又有何助益或限制？最後，兼具政治性與在地性的婦女宣傳網，在政黨滲透、選舉參政與父權社會交織情境下，這些來自各地的女性菁英們的生命經驗與價值認同又是如何展現？換言之，除了奉命行事，女性個人的自主性與能動性能否顯影？

因此，本文將結合國民黨有限開放的黨務文書、手冊與檔案，並輔以全臺黨工的《臺灣黨務》投稿、各地女性菁英的口述與回憶資料、婦工會出版品等報刊雜誌與其他一手史料，試圖構築婦女宣傳網的組織運作、工作目標、宣傳模式與實踐樣貌。是以，本文先從制度面檢視宣傳網的建立與宣

18 游鑑明，〈國民黨走向家庭：婦女之家的社會服務（1956-1998）〉，《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7（2016 年 6 月），頁 191-264。

傳員的選訓；其次分析宣傳工作中服務性與家庭化的性別特質，展示其中呈現的父權與黨國意識形態；最後則以輔選與八七水災賑濟兩項任務爲案例，從長期性與突發性的兩種情境具體觀察婦女宣傳員如何運用組織資源與性別角色完成業務、扎根本土，藉以描繪 1950 年代國民黨菁英女性、臺灣社會與黨國體制間的交織圖像。

最後，本文所稱之「婦女宣傳網」，係指 1955 至 1962 年間國民黨內基層婦女宣傳政策之一。本文以 1950 年代爲討論時段，乃因該期爲國民黨遷臺後鞏固統治的重要階段，各項動員機制亦在此時逐步建立並走向制度化。[19] 婦女宣傳網作爲國民黨在全臺推行婦女宣傳工作的初步嘗試，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漸形成。隨著 1962 年婦女宣傳網併入各級婦工體系，其運作經驗亦成爲日後臺灣婦女動員與輔選的基礎。因此，檢視婦女宣傳網的制度形成與地方實踐，不僅有助於補足戰後臺灣政治動員研究中的性別面向，也爲理解黨國體制在 1950 年代如何透過家庭與社區層面滲入基層社會提供新的觀察視角。

---

19 有關 1950 年代作為國民黨鞏固統治的關鍵期討論，請見若林正丈著，許佩賢、洪金珠譯，《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 167-169；薛化元，〈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再評價——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的比較〉，《臺灣風物》，卷 68 期 4（2018 年 12 月），頁 167-204；任育德，《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新北：稻鄉出版社，2008），頁 1-2。

一、婦女宣傳網的建設機構：各級婦工組織

（一）中央婦工會的組織概況

1953 年，國民黨正式成立中央婦女工作會，由宋美齡常任指導長，恢復黨內婦女工作的最高層級。婦工會由原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升格而來，更名爲「婦女工作會」，乃因宋美齡主張過去的婦運機構僅著重運動動員，未能奠定長期基礎，故需轉型爲「永久的、長期的」工作體系，以確立制度化與常態化的婦女方針。[20] 正如長期擔任婦工會主任的錢劍秋所言，國民黨的婦運與婦工本質相通，皆在配合政黨動員婦女。[21]

從機構組織的角度觀之，作爲國民黨中央直屬機構與黨國時代全國婦女界的領導核心，中央婦工會的內部架構嚴整而層次分明。其組織依黨規設置，設有正、副主任各一人，下轄秘書、專門委員、幹事與編審等職。[22] 會內分爲五室：第一室主管組織、訓練與指導，第二室負責輔導與服務，第三室辦理調查與研究，第四室專司宣傳工作，秘書室則統籌總務與行政。[23] 此結構反映國民黨以科層化體制推動婦女工

20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蔣夫人言論選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0），頁 210。

21 錢劍秋，《戰地黨的婦女工作講述綱要》（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65），頁 2-3。

22 人員編制為正副主任各 1 人、秘書 1 人、專門委員 4 人、總幹事 4 人、編審 5 人、幹事與助理幹事 9 人。參考自皮以書，《中國婦女運動》（臺北：婦聯畫刊社，1973），頁 126。

23 婦友社編，《自由中國的婦女》，頁 18。

作的治理邏輯以及政黨納管婦運的機制已然成熟。

因此，婦工會業務性質繁雜，舉凡吸收女黨員、聯繫各界婦女與團體、輔選動員、幹部訓練、後勤與救護訓練、策動地方婦女組織辦理家庭副業與手工業等生產訓練、成立婦幼服務組織「婦女之家」、養女保護、反共與國策宣傳、婦女國語識字、婦幼調查、家政與家風研究等各項（被認爲）與婦女有關的工作無所不包，業務主要配合國策黨意，亦兼服務婦孺，爭取民意支持。[24]

然而，新成立的婦工會雖在制度上升格，但在黨中央則處邊緣，曾任職於婦工會的匿名受訪者表示：「我們（婦工會）在黨裡面被當成弱勢，不太被重視，甚至是可有可無」，連預算都「只有其他組會的尾巴而已」，[25] 亦有研究者整理自 1954-1957 年間國民黨中央各處組會預算分配，發現婦工會始終居於「後段班」，在 14 個單位排行第 8 位。[26]

就經費而言，錢劍秋亦曾在 1956 年致函各級婦工同仁，坦承會務不順，主因即是人力與財力的不足，聯繫地方組織的效能更有待加強。[27] 然而，直到 1969 年，錢劍秋仍持續地對外坦承該會「黨外同胞，既不明白，黨內同志也不易全都瞭解」、「沒有太多的助力」，且預算上，「數額很小，……，至今還是不能配合工作發展的需要」，[28] 足見經費微渺、黨

---

24 游鑑明，〈臺灣地區的婦運〉，收入《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 480-485。

25 張毓芬，〈女人與國家：臺灣婦女運動史的再思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 7 月），頁 44。

26 許芳庭，〈戰後台灣婦女運動與女性論述之研究（1945-1972）〉（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1 月），頁 85-86。

27 錢劍秋，《經驗的歷程》，頁 35。

28 錢劍秋，〈婦女工作的回顧與前瞻〉，《婦友》（臺北），期 173（1969 年 3 月），頁 4。

內其他組會並不重視，員額與財額沒法吻合需求。綜合婦工會各級幹部與人事的說法與黨內預算編列情形來看，婦工會在黨中央明顯處於弱勢，其組際關係也同樣耐人尋味。

就黨中央內部的組織關係而言，婦工會以特定性別爲主要工作對象，與其他專責「組織、訓練、民運、宣傳、研究、海外」等特定任務的中央組會不同，其業務凡與婦女相關者皆在職權範圍內。這一特性使婦工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卻也因此缺乏對單一業務的專精與不可取代性。事實上，在實務工作上也確實常有混淆衝突、多頭馬車等問題。[29]

若僅以「性別」爲存在依據，當性別觀念式微時，婦工會的功能與價值便容易被削弱，淪爲黨的決策體系下游、被動執行的輔助機構。從 1962 年黨中央對各處組會的考核報告乃至於 1963 年婦工會自己提報的工作報告皆可看出：婦工會多以「協辦」名義配合其他單位的主辦任務，顯示主動性不足，地位邊緣。[30]

尤有甚者，誠如前言所述，婦工會成立後，臺灣婦女界逐漸形成由宋美齡統合的三大婦女組織共治之格局。然而，儘管婦聯會與婦工會在人事配置與婦工業務上高度重疊，兩者在組織性質與運作邏輯上仍存差異。婦工會隸屬國民黨，運作受制於政黨結構；相較之下，婦聯會則位處民間，具有較大的組織彈性，加以宋美齡長期主導與培植的歷史淵源以

29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編，《區級幹部分區講習研討資料》（出版地不詳：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1966），頁 152。

30 中央委員會設計考核委員會編，《中央委員會各單位五十一年度中心任務執行情形檢查報告表》（臺北：中央委員會設計考核委員會，1962），頁 11-12、14；中央婦女工作會編，《重要工作報告》（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63），頁 3-4。

及各地分會多由縣市首長夫人出任所形成的動員優勢，使其在社會網絡與資源整合上更具主導性。此種差異，亦使婦工會在黨內定位上屢顯侷限，在與黨外婦女團體的競合關係中難以取得充分主動權。[31]

（二）地方婦工單位的組織概況

1953 年中央婦工會成立後，國民黨隨即推動地方婦工單位的建置。1954 年臺灣省黨部正式設立省級婦工會，各縣市黨部亦相繼增設專責婦工事務的第四組（亦稱婦工組）。[32] 至 1956 年，產職業黨部陸續設立婦工組；1958 年知青黨部也設置相應單位，瞄準大專院校，翌年更延伸至金馬前線。[33] 此外，婦工會首創婦女義務幹事制度，每年動員逾 2,000 名女性幹事為黨無償服務，與各級黨部共構一套上下貫通、分層明確的婦工體系。這些義務幹事除協助各地婦女與家庭工作外，亦常兼負宣傳任務，構築起國民黨婦女基層工作的在地

31 有關婦工會、婦聯會與省婦女會的競合關係，請見游鑑明，〈臺灣地區的婦運〉，收入《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 468-478；曾令毅，〈婦女團體抑或「附隨組織」：婦聯會與國民黨相互關係之探析〉，《黨產研究》，期 2（2018 年 3 月），頁 90-91；藍暄侑，〈1950 年代臺灣婦女宣傳工作〉（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 年 7 月），頁 101-106。

32 有意思的是：各縣黨部新增的第四組（即婦工組）為 1950 年代縣黨部各組業務整併風潮下唯一始終維持單一業務的組別，並未出現與其他業務共組之情形，情況相當特別。參考自任育德，《向下紮根》，頁 120-121。

33 錢劍秋，〈國民黨婦女政策及婦女工作之研究〉，收入三民主義研究論文集編纂委員會編，《三民主義研究論文集》（臺北：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1965），頁 1026。

網絡。[34] 此種以志願勞力支撐的運作方式，使婦工會在地方滲透的成本極爲有限，反映國民黨對婦女工作的資源投入仍屬不足。[35]

因此，中央婦工會的資源困境，也反映在其管轄的各地婦工單位：1958 年 5 月，錢劍秋就曾上呈黨中央，指出各縣市婦工編制有缺不補、經費挪用之弊相當常見。[36] 曾任臺灣省黨部編審、高雄縣（今已併入高雄市）與臺中市黨部婦工組長的胡梅英（1947-）也同樣坦言，地方黨部長官多口稱婦工重要，實際上卻「重男輕女」，導致經費「愈編愈少」，對其包羅萬象的任務缺乏實質支持。[37] 由此可見，上自中央、下至地方，婦工單位雖名爲獨立組織，實際運作上仍受制於黨內性別階序與經費分配結構，名高而實低。

然而，制度化的獨立設置仍具一定意義。錢劍秋曾坦言婦工會「有比無好」，其成立至少確保基本的人員編制與經費來源，爲後續組織運作提供制度保障。[38] 婦工會也藉由黨改造後的「四大單元」──地方、產職業、知識青年與金馬前線──深入基層，達成「上下一貫」遍及全臺的效果，使各行各業與不同界別的女性接受國民黨的組織，推動宣傳則

---

34 起初義務幹事兼任宣傳員並非強制，而是鼓勵制，從 1955 年 9 月錢劍秋寫給婦工會同志的指導信函即稱「不必勉強」兼任，反而當循循善誘。參考自錢劍秋，《經驗的歷程》，頁 11。

35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工十年》，頁 89。

36 「八屆中委會工作會議第 23 次會議紀錄（1958 年 5 月 09 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國民黨〉，檔號會 8.4/4。

37 胡梅英，〈感恩與期望〉，收入謝鴻儀總編，《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一甲子年史》（臺中：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2000），頁 263。

38 錢劍秋，〈婦女工作的回顧與前瞻〉，《婦友》，期 173，頁 4。

更順暢。[39] 以大學女教授爲例，史學家曾祥和（1920-2013）曾提到她任教臺灣師大時，婦工會黨工曾與之接觸，並不顧其婉拒入黨的意願，恐嚇對其職涯不利，使她到晚年仍記憶猶新。[40] 曾祥和專注教職，對政黨政治不感興趣，其意志固然堅定，但從此例仍可見婦工會網羅全國各界女性的行動與樣態強勢而果斷，其動員力可見一斑。

同樣地，1950 年代國民黨積極謀求對人民團體的控制力道，時常介入團體改選與內務，期納入政黨外圍組織，提升政黨對社會各群體的滲透力，使在公職選舉時發揮效果。[41] 隨著各地婦工組漸次成立後，也逐步爭取各地婦女會系統、助產士、農漁民、軍眷與裁縫等各界婦女的支持。[42] 因此，中央婦工會成立後便積極與省婦女會合作，除了使其「隨時接受黨的號召，配合政策，完成交付任務」，[43] 省婦女也須接受婦工會「指導與監督」；各縣市婦女會秘書與各鄉鎮婦女會負責人等亦須兼任各地婦工組長與地方婦工幹事。[44]

位處基層的縣市層級、乃至於鄉鎮區級的婦女會與婦工單位合作無間，這與各縣市社會團體的負責人常被要求兼任

---

39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我們的工作》（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76），頁 1-2。

40 曾祥和口述，沈懷玉、游鑑明訪問，周維朋記錄，《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頁 297-298。

41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 122-125；任育德，〈中國國民黨輔選動員機制之建立及其發展（1950-196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25，頁 86。

42 楊百元，〈彰化婦工的燦爛遠景〉，《臺灣黨務》（臺北），期 165（1957 年 7 月），頁 23。

43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我們的工作》，頁 7。

44 吳雅琪，〈臺灣婦女團體的長青樹：臺灣省婦女會（1946-2001）〉（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7 月），頁 176。

當地黨職的慣例有關。[45] 以宜蘭縣爲例，來自羅東的女醫陳石滿（1909-1997）就指出：她在 1950 年創立宜蘭縣婦女會時就被要求入黨，最後才因主管婦女會而循例兼任縣黨部委員，與時任蘇澳漁會總幹事的吳佩馨（1910-？）[46] 在黨部共事。[47] 再以臺南市爲例，1954 年該市婦工組成立後，隔年便輔導了市婦女會選舉，並扶植黨員當選理監事。[48] 若就更基層的鄉鎮市區層級而言，樹林鎮（今新北市樹林區）的女性菁英賴月桂（1932-）在鎮公所上班時入黨，並在黨中央受訓完畢後返鄉聯合當地女性菁英們成立樹林鎮婦女會。[49]

從以上案例來看，全臺各地以臺籍爲主的婦女會與當地

45 以同樣地方層級分明的農會為例，學者黃仁姿也指出：1950 年代國民黨已透過操控農會選舉並收編菁英，在縣市層級上完成對農民事務與農會系統的掌控，多數縣市的農會總幹事也都兼具地方黨職。請見黃仁姿，《國民黨政權與地方菁英：1950 年代的農會改組》（臺北：國史館，2011），頁 203-213。

46 根據陳石滿口述，其稱 1950 年代於縣黨部共事者為「蘇澳漁會理事長吳培香」。惟筆者查閱「蘇澳區漁會歷任負責人（理事長、常務監事、總幹事，1942-2013）」一表，未能檢見「吳培香」相關記載。若綜合其所述年代與蘇澳漁會實際人事名單，則陳石滿所指者較可能為在 1950-1960 年代長期擔任蘇澳漁會總幹事之吳佩馨。參考自彭瑞金總編輯，《蘇澳鎮志》（蘇澳：蘇澳鎮公所，2014），頁 360。此外，吳佩馨為蘇澳地方重要人士，曾長期擔任民意代表及農漁會要職，並曾任宜蘭縣議長，其生平事略可參見同書，頁 835。

47 陳石滿口述，游鑑明主訪，黃銘明紀錄，〈陳石滿女士訪問紀錄〉，收入《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 241。

48 江丕丞，〈南市婦女會改選經過〉，《臺灣黨務》，期 100（1955 年 3 月），頁 52。

49 賴月桂口述，曾文亮訪問，吳美慧、李思儀紀錄，〈賴月桂女士訪問紀錄〉，收入《百年回眸：臺北第三高女校友口述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3），頁 173-174。

婦工單位間高度重疊的人事、職權與互動模式，顯示國民黨透過婦女組織網絡形成縝密的合作結構，在資源匱乏之處積極謀求跨省籍的婦女菁英相互合作，共同爲國家掌握地方婦女，當然也暢通宣傳的上下管道。

關於制度上，婦工會如何運用黨內「四大單元」以及黨外「輔導外圍組織」以達對臺灣全面的控制，筆者繪製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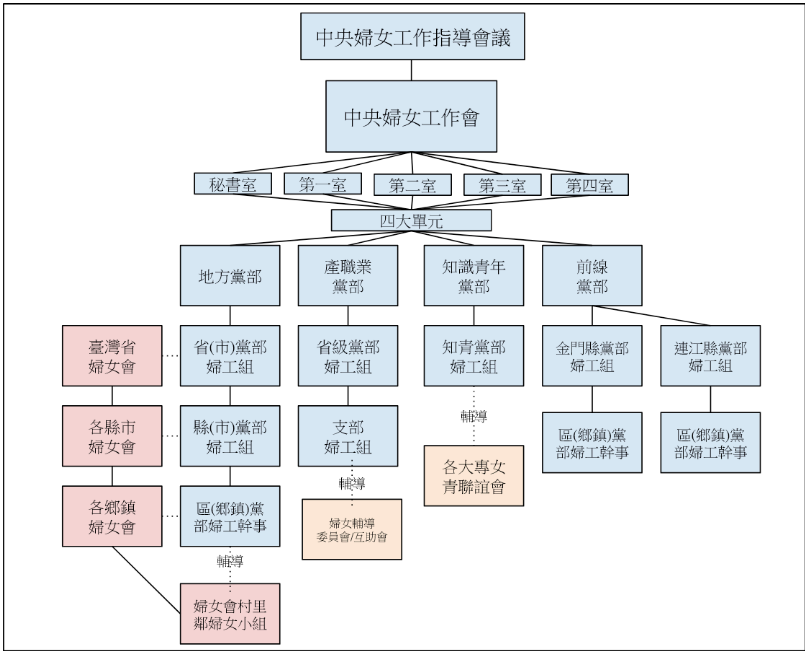

圖 1　婦工會「四大單元」暨輔導外圍組織系統圖[50]

50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我們的工作》，頁 1-2、7-8；吳雅琪，〈臺灣婦女團體的長青樹〉，頁 176。

（三）雙重義務制度的建立

1955 年，中央婦工會將年度動向釐定爲「切實深入普及到每一處地區的角落」，[51] 於是便發函省黨部予各縣市婦工組，並將婦工會重點設定爲「1. 建立區黨部婦女幹事，2. 繼續督導義務幹事推動基層工作」，正式確立「使婦女工作永久的深根」政策，走向基層。[52]

然而，放眼整個黨中央，自 1954 年第七屆四中全會時，即已針對黨內幹部管理不統一進行檢討，如何健全基層幹部始終無解，直至 1956 年 5 月的七中全會上，方正式通過「中國國民黨幹部制度大綱」，除了明定專職幹部的任免規定外，更納管不支薪的「義務人員」，定義如下：

> 第二十五條　各種黨部除設置專職工作人員外，並得設置義務服務幹部，征調有職業之黨員為黨工作，用其才智促進黨務發展。[53]

1956 年 5 月，國民黨中央正式將各級黨部中由「有職業之黨員」兼任的義務服務幹部納入規章，可見在制度設計上，黨的基層組織理想上應以專職人員爲主，輔以義務性兼職人員。然而，這一原則在婦工組的實際運作上卻未必通行。因爲早在 1955 年 3 月至 9 月間，中央婦工會已搶先此規定開跑，由中央自上而下建立架構，率先採取大規模任用義工的方式以應基層人力之不足，「婦女義務幹事制度」於焉誕生。直到同年 8 月，各區黨部的專職婦工人員方才陸續

---

51 錢劍秋，《經驗的歷程》，頁 11。

52 錢劍秋，《經驗的歷程》，頁 13。

53 「特交檔案（黨務）（1956 年 5 月 07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 002-080300-00021-010。

設置，始有專人投入鄉鎮市級的婦女工作。[54] 此一時序顯示，基層婦工組的發展路徑乃是以義務人力爲先行，待組織基礎穩固後，方逐步建立正式職缺。

對免費勞力的高度渴求透露國民黨中央與地方對婦女工作投入資源一貫的淡薄，專任職缺姍姍來遲，卻仍明顯不足。根據 1956 年的「各級婦工組職員姓名冊」來看，臺灣省婦工會只有 7 名專職人員，各縣市婦工組則僅有 2 至 3 名專職人員不等，苗栗縣與臺南市則僅有 1 個名額。[55] 事多人少的困境刺激婦工會必須自主變通，設法自籌人力。

1955 年 7 月至 12 月間，隨著無酬的「婦女義務幹事制度」建立，中央婦工會又以「不取任何報酬」與「不計個人利益」爲宗旨，陸續推展「婦女宣傳網」建設。[56] 事實上，無論是「婦女義務幹事」或「婦女宣傳網」，皆爲婦工會首創的義工制度。雙重義務幹事並不受薪，但卻逐漸被該會視爲它在臺灣推動基層婦女工作的兩大支柱。[57]

1955 年 3 月，錢劍秋在致各級同仁們的信函指出，國民黨在 1954 年度報告中已將「家庭訪問」列爲重點工作，以鞏固基層組織，並期望 1955 年能透過縣市婦工組落實推行。然而，她也坦言人力薄弱的根本困境，因而建議「可設法擬訂分期訪問和發動婦女黨員協同訪問的辦法」等因應措施。[58] 錢劍秋雖奉命自中央，卻苦於資源匱乏，只能仰賴基層女性

---

54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工作幹部手冊》（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56），頁 22。

55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工作幹部手冊》，頁 51-58。

56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黨員集訓教材》，頁 69；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工作幹部手冊》，頁 24。

57 錢劍秋，《經驗的歷程》，頁 49。

58 錢劍秋，《經驗的歷程》，頁 7。

黨員的義務投入。

出乎意料地，這種基於女性志願勞動的動員策略卻取得顯著成效。於是，1955 年 9 月，她正式指示全臺各地建立「婦女宣傳網」、聘任宣傳員，並進一步推展「全省義務幹事制度」，盛讚各縣市婦工組義務徵人的成功經驗「試行有效」，並全面推廣。[59]

相較於以專職人力爲主、義務人員爲輔的編制理想，基層黨部實際更依賴義務性人事，顯示人力與經費短缺已成普遍現象，宣傳業務尤其吃緊。[60] 此問題雖非特定性別獨有，但國民黨對無須支薪的婦女義工顯然抱持更高興趣：根據錢劍秋在 1981 年的報告，當行之多年的婦女義務幹事在當時早已體系完善、遍及各種黨部且達 78,613 人的龐大規模時，國民黨才「正式全面建立義務幹部制度」。她更回憶：當初創此制度即是因區級基層黨部專職不多，「婦女幹部更是限於名額」，揭示國民黨聘任專職有性別考量，當員額不足時，女性專業者更受輕忽。[61]

根據黨內檔案可知，在基層黨部的婦工組中，除多數爲義務性人力外，少數專職幹事的處境亦異於他組的正職人員──她們被明文界定爲「非正式編制人員」，薪資不列入預算，其月薪須由婦女會與民眾服務站共同支付，待遇與福利均「不能與正式編制內人員相比」。此種同工不同酬的制度設計嚴重打擊士氣，也反映國民黨對基層婦工的制度性歧

---

59 錢劍秋，《經驗的歷程》，頁 9-11。

60 中興山莊編，《基層黨務工作的方法》（臺北：中興山莊，1962），頁 134-135。

61 錢劍秋，《貫徹本黨政策　做我們應做的工作》（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81），頁 5-6。

視，直到 1958 年問題方得正視。[62] 從中可見，國民黨對基層婦女工作的態度與其對中央婦工會的忽視如出一轍——在給薪條件不穩、經費不足的情況下，首先犧牲婦女工作，迫使其不得不倚賴義務人力。

1957 年 3 月，國民黨召開第七屆八中全會時，公布其成果即是在基層黨部積極開辦婦女訓練班與講習會，選訓女員不遺餘力，但對此訓練工作的改進意見則是「對婦女訓練中所發現人才應分別聘爲義務幹事或宣傳員，課以固定任務」，更不斷呼籲「加強婦女義務服務幹事與宣傳員之考核及指導」。[63] 中央黨部檢討婦女工作缺乏人才，解方竟是再尋女性義工補缺，甚至直接將「調整婦女義務幹事與婦女宣傳員力求達到『一鄰一人』之目的」訂爲 1957 年度目標。[64]

尤有甚者，錢劍秋更在 1969 年表揚這群身居基層、不受薪更自費交通與餐食，且時已超過萬人的無名大軍：

> 十餘年中，每年擔任義務服務的同志，平均兩千多人，到目前為止總數已超過了一萬六千餘人，可以說每一件工作的發動，全是靠這萬餘熱心的同志辛勞跋涉的支援，因為各層級婦工組的工作人員，為數極少，全面深入推動工作，必須全面有推動工作的幹部。[65]

---

62 「八屆中委會工作會議第 33 次會議紀錄（1958 年 7 月 31 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國民黨〉，檔號會 8.4/14。

63 劉維開，《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務工作報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7），頁 152。

64 「七屆中常會第 381-397 次會議紀錄（1957 年 10 月 07 日）」，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號會 7.3/654。

65 錢劍秋，〈婦女工作的回顧與前瞻（下）〉，《婦友》，期 175（1969 年 4 月），頁 3。

錢劍秋直言基層人員「爲數極少」。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義務性制度皆是侷限於人力與物力而生，因此「可以說每一件工作的發動」都仰賴這群熟諳在地社群的女性義工，依賴度不容小覷。

然而，這群女性義工身負重任卻飽受質疑。1955 年 11 月，任職於桃園縣黨部婦工組的何寶珍（1924-2011）就在黨員刊物《臺灣黨務》投書，提及她推展義務幹事時的挫折與奮進：

> 我們做任何一件事情，必需具備信心，始可克服困難。尤其是婦女工作，在男同志中，多批評婦女的管家婆，不願鼓勵與策動，甚而忽視婦女工作。因此，這件「設置義務幹事」工作多被認為「閉門造車」「不可思議行不通做不到的事」「誰吃飽飯拖著一把孩子替你幹義務工作」。現在這些主觀的批評，都給我們嚴謹的態度與無比的勇氣所粉碎。[66]

上述情況無論源於經費匱乏或行政怠慢，皆反映出婦女工作在黨中央與地方層面長期被忽視的現實。更進一步地，男性黨工對婦女工作的態度多半帶有偏見：正如何寶珍所形容的「管家婆」式的性別歧視。然而，婦工幹部們一如何寶珍無視性別歧視，反而以實際行動完善任務，日益展現不讓鬚眉的工作實力。

---

66 何寶珍，〈婦女工作下鄉記〉，《臺灣黨務》，期 116（1955 年 11 月），頁 33。

二、婦女宣傳網的制度建構與人才選訓

（一）婦女宣傳網的建設緣起

學者 Elaine Tyler May 曾在其文化冷戰的研究名著 *Homeward Bound* 一語雙關地指出，美國在冷戰時期興起「家庭／國內圍堵」（domestic containment）現象，結合反共政策與大眾文化，將穩定傳統的核心家庭與男外女內的性別分工視爲維繫秩序與鞏固國安的基礎。[67] 這種把女性主持的家庭日常視爲冷戰防線的思維，反映當時反共陣營在面對解構兩性秩序的共產勢力時，往往採取類似的家庭政策與父權計畫。同樣旨在透過婦女同胞於家爲國，婦女宣傳網被發明於 1950 年代，其「宣傳到家」的政策精神看似復古，卻實與國際時局的保守思潮若合符節，可視爲冷戰體制下家庭化政治動員的一環。

因此，回到國內來看，在討論婦女宣傳網前，必須先認識隸屬於婦工會第四室的宣傳任務。長年任職第四室總幹事的王文漪曾在 1960 年撰文自陳其「受盡煎熬」的黨工生涯，也揭露第四室的具體業務：

> 宣傳工作，實在是極為紛繁的，固不限於編輯婦友，諸如叢書、廣播、宣傳網以及慶祝婦女節、兒童節、母親節等等，似乎都是我的事。[68]

---

67 Elaine Tyler May,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p. xxiv-xxv, 13-14, 201-203.

68 王文漪，〈十年煎熬〉，收入陳紀瀅編，《十年》（永和：文壇社，1960），頁 72。

王文漪一句「極爲紛繁」，道出婦工會宣傳業務的龐雜，也坦白了資源不足的現實。她身兼多職、事必躬親，「似乎都是我的事」，反映婦工會在黨內邊緣化的處境與人力短缺的現象。婦工會的邊緣地位，使其在中央資源分配上長期居於弱勢，進而顯示黨中央對其掌控的有限與無心。此種現象同時也能見出 1950 年代國民黨基層黨務仍未穩固的現實：可供基層動員與福利運作的資源極爲有限，[69] 黨國體制的滲透與控制力道也遠不如中共的縱深體系，因而淪爲一種「有限的列寧式政黨」（a Leninist-inspired but constrained party）。[70]

正因如此，學者柯惠鈴曾指出國共兩黨在婦女動員上的差異：中共自 1920 年代即嚴格貫徹婦女工作，而國民黨則長期散漫行事。[71] 如此情狀在 1950 年代仍未見改善。然而，這種組織鬆散的結構也意外爲婦工會內的女性菁英開啓更大的自主空間，女作家主持婦女宣傳工作遂成爲當時婦聯會與婦工會等組織常態，再加上第四室經費與人手有限，更只能大量依賴編制外的女作家志願參與。[72]

無可否認的，總幹事王文漪與志願參與的女作家多具忠黨愛國的立場，但不受嚴密的黨工體制束縛與金援，得以在

---

69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輔選動員機制之建立及其發展（1950-196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25，頁 76-77。

70 Thomas B. Gold, "Retrocession and Authoritarian KMT Rule (1945-1986)," in Gunter Schubert,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Taiwa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36-50.

71 柯惠鈴，《她來了：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激越時代的婦女與革命，1920-1930》（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頁 166-169。

72 游鑑明，〈是為黨國抑或是婦女？1950 年代的《婦友》月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9，頁 86。

相對自由的空間展現創意與能動性。事實上，王文漪本身即爲女作家，亦幾乎獨力承擔婦工會所有宣傳事務，從撰寫宣傳綱要、策劃活動到執行工作，全程親力親爲。她自述「忙得不亦樂乎，但也忙得不亦慘乎」，[73] 道盡當時女性宣傳家在政治邊陲中維繫工作理想的心境。

然而，論及國民黨內的宣傳機構，我們則能發現黨內已有專責對國內宣傳的第四組、海外宣傳的第三組、大陸宣傳的第六組，[74] 那麼婦工會宣傳業務的究竟定位與特點爲何？錢劍秋 1961 年 7 月在中常會上報告解釋道：

> 黨的宣傳工作，固有主管單位主其事——第四組——但因一半的國民婦女，多處於家庭，對於社會情況，國際現勢，大陸匪情，每多隔閡，故宣傳工作，應力求普及於一般婦女。[75]

由此可見，「國家半數人口爲婦女」的論述始終被視爲婦女工作存在的正當依據，而婦女宣傳工作的合理性，則藉由強化「女性在家」的性別刻板印象而得以建構。此種論述策略在無形中削弱婦女對公共事務與時局變化的感知能力，反而成爲婦工會宣傳業務持續存在的論述前提。

因此，錢劍秋所用詞彙爲「一般婦女」，顯然在定義上有所取捨，對於被宣傳者的素質有所保留，流露知識婦女對非菁英婦女具有啓蒙與教化責任。該會對內發行的黨員教材

---

73 王文漪口述，樸月專訪，〈幽蘭勁竹寫平生：訪王文漪先生〉，《文訊》，期 30，頁 184-185。

74 余敏玲，〈導論：同中有異的兩岸黨國體制〉，收入《兩岸分治》，頁 14。

75 「第八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 312 次會議紀錄（1961 年 7 月 15 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國民黨〉，檔號會 8.3/312。

也同樣抱持此觀點：訴求知識婦女對「平日生活範圍狹窄，見聞不廣」的家庭婦女與農村婦女負起宣傳職責，同時也呼應當局「宣傳下鄉」政策，進一步延伸爲「宣傳到家」，方能將國民黨意識形態「普及深入於各個地區和各個家庭」。[76]

可見，婦工會雖然重視家庭爲宣傳基層單位，但相較於其工作推動的必要性，更輕視作爲家務勞動者的應外能力，以此在男性主導的政壇自我標榜，卻也因而確認與加強父權社會對女性深居簡出、不諳世事的刻板印象。一如學者陳佩甄的觀察，冷戰體制下的臺灣與南韓社會將婦女群體二元地分化爲反共的現代婦女與必須被拯救的落後婦女，用以鞏固國內的性別社會，有利普及政治宣傳於民眾日常生活。[77]

自 1953 至 1954 年，中央婦工會仍處於草創之初，第四室主要仍蕭規曹隨，宣傳業務並未與升級前的第五組中央婦運會時期有太大區別，對於臺灣基層的宣傳工作仍不成熟。從 1953 年中央婦工會成立未滿 3 個月時所呈報的下年度上半年工作規劃來看，即是：

> 宣傳方面，主要者為對大陸婦女同胞廣播，激起反抗共匪強暴，強調婚姻自由為個人自由，反對干涉婚姻破壞家庭，並宣傳本黨主義及政綱政策等為中心業務。[78]

可見內容具體性不足，但具有婦女宣傳工作的政策性延續，目標受眾仍以臺海對岸的「大陸婦女同胞」爲主，而非臺灣

76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黨員集訓教材》，頁 46。

77 陳佩甄，《冷戰的感覺結構：台韓文學與文化中的性別與情感政治（1950-1980）》（臺北：政大出版社，2024），頁 129-130。

78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央委員會各處組會四十二年度工作檢討報告》（臺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印行年不詳），頁 99。

基層女性。

1954 年，隨著婦工會各項工作逐步開枝散葉後，對臺灣內部的宣傳成果方展鴻圖，據其當年提報的年終檢討報告來看，主要工作項目有：展開廣播宣傳、出版宣傳叢書、展開漫畫照片宣傳、策動舉行婦女節與兒童節紀念活動、創辦《婦友》月刊六大項。[79]

綜觀中央婦工會成立初期的宣傳工作，其整體面貌仍顯草率，更缺乏創新，未能有效突破宣傳工作浮於中央、難以下鄉的結構性問題。此時期的宣傳方針主要聚焦於文字與理念的「文宣」建構，宣傳對象則鎖定具識字能力的女性菁英。這種上層導向的策略，雖有助於在意識形態層面奠定婦女工作的理論基礎，卻與當時婦女菁英教化底層婦女的社會期待不符，更無法回應黨中央在基層動員上的困境。如斯困境並非特例，早在中日戰時，鼓吹對日抗戰的婦女刊物同樣百花齊放，但曲高和寡，也難以回應當時全中國農工婦女高達 80%的文盲人口。[80]

婦工會宣傳工作的實質轉折，出現在 1954 年底至 1955 年間。隨著臺灣省黨部及各縣市黨部陸續成立婦工單位，並配合基層幹部訓練與組織擴編，婦工會逐漸具備下沉基層的條件與動員能力。1955 年後，其宣傳工作在延續既有項目的同時，也出現若干制度性創新——最具代表性的即爲「建立

---

79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央委員會四十三年年終工作檢討報告》（臺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54），頁（婦）25-28。

80 呂芳上，〈抗戰時期中國的婦運工作〉，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第一輯，頁 404、397。

各地宣傳網」與「舉辦每季宣傳活動」。[81] 其中，「各地宣傳網」的建構尤具意義，它標誌著婦工會開始由文宣生產轉向基層布建，其核心人力則建立於上述的「婦女宣傳網」與「婦女義務幹事」兩項姐妹制度，再顯中央與地方婦工單位在經費與人力上的困境與變通。

因此，1958 年，婦工會明文論及「婦女宣傳網」的建設理念，其實即是延續上述錢劍秋的雙重觀點：對家庭宣傳的重視以及對家庭婦女知識的不信任。引文如下：

> 當前黨的宣傳工作，實已多方策進，惟以限於人力，對廣大民眾間的家庭宣傳，有待設法推進，且實施家庭宣傳，當以運用婦女力量，較為恰當，尤以對農村家庭婦女宣傳，更非婦女不能深入，故本黨創建婦工宣傳網制度，以負此一任務，蓋家庭婦女與社會接近的機會較少，見聞自亦狹隘。[82]

透過「婦女宣傳網」與「婦女義務幹事」兩套基層動員體系，婦工會得以在黨國體制下逐步完備下鄉布局，完成從上層的宣傳論述到下層的地方實踐的健全通道，並透過居住在全臺各地基層婦女們直通家家戶戶，性別化地達成「宣傳到家」的滲透願景。

（二）婦女宣傳網的布建方法

婦女宣傳網雖首創於 1950 年代婦工會，反映同期的冷

---

81 「中央婦女工作會四十四年七月至四十五年六月份工作進度表（1956 年）」，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號會 7.0/10。

82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黨務工作中婦女工作的重要性》（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58），頁 7。

戰思維，但其概念仍有自身的歷史脈絡可循。早在中日戰時，國民黨曾動員各省的女性菁英從事抗戰宣傳，針對非識字婦女展開多樣化的政治啓蒙工作。這些宣傳形式包括：利用民眾集會場合或街頭現場開講、組織宣傳隊與歌詠隊下鄉以及運用歌舞與戲劇等親民方式吸引群眾駐足聽講。[83] 雖然這些零星分布於各省的基層宣傳嘗試尚屬初步，卻已呈現「婦女宣傳網」的雛形，爲後來的制度化建構提供可資參照的實踐典範。

然而，要使此類婦女動員工作眞正形成具備持續性與覆蓋性的全國網絡，並有效整合地方女性的參與及協力，仍需仰賴更完整的行政架構與穩定的政治環境。1950 年代，隨著國民黨在臺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黨國體制，婦工會方得以在中央指導與地方執行並行的條件下，將過去鬆散的婦女宣傳經驗制度化與普及化，也才有機會使「婦女宣傳網」成爲由上而下、具備全臺滲透力的政治宣傳機制。

同樣地，對在中日戰爭期間分屬敵對陣營、接受皇民化動員的臺籍菁英女性而言，這樣的宣傳任務與經驗也不陌生。當時，日本殖民政府也將她們編入婦女組織，指派其負責推展日語教育、皇民教育與政令宣傳，同時執行防空、防護、救護與節約家計等戰時指導工作。[84] 由此觀之，無論是中國的抗戰宣傳，抑或日本的戰爭動員，兩者雖分屬對立體制，卻在女性角色的設定上高度相似：皆以受過教育的女性

83 洪宜嫃，《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臺北：國史館，2010），頁 308-311、362。

84 洪郁如著，吳佩珍、吳亦昕譯，《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頁 396-397。

菁英為中介，期望她們透過母職、教化與服務等女性化的形象，將國家意識形態滲透至家庭與社區的日常層面。

1956 年國民黨對內發行的《婦女工作幹部手冊》載明「中央婦女工作會舉辦四大工作的提示」，將「建立義務幹事制度」、「創設『婦女之家』」、「指導婦女同志研讀訓詞」與「組織婦女宣傳網」列為當時的四大工作，而「婦女宣傳網」身負「將本黨主義及政綱政策，以及當前國際局勢的現況」深耕基層婦女，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關於宣傳網的建設與推行，自然也有所依歸。[85]

首先，在宣傳網的建設與推行上，其分布「是以縣市為重心，就各地工作轄區普遍分設駐點，每一個駐點以選設宣傳員一人至二人為原則」；至於推行方法，則是每月直接頒發宣傳資料〈宣傳網指示〉，並從中指導宣傳員操作技術與交流問題，使其能順利遵照婦工會的宣傳主題，化平板文字為生動口語，按部就班，完成任務。此外，場地則「最好是在村里民大會席上，用口頭宣傳號召群眾，必可以收穫全面宣傳的功效」，場地現成，事半功倍，繼承中國抗戰時期講求群聚宣傳的效率經驗，卻也再度彰顯撙節開支的現實。事後檢討方面，則每月同樣頒發〈宣傳員報表〉供宣傳員回饋檢討與改進內容，形成位處高層的中央婦工會與第一線宣傳工作者溝通的雙向管道。由此可知，從縣市部署、工作資料與場地安排，再到事後檢討等標準流程都受到完整設計，井然有序，以免重蹈覆轍。[86]

由此可見，《婦友》與「婦女宣傳網」同為婦工會第四

85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工作幹部手冊》，頁 27-31。

86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工作幹部手冊》，頁 31。

室的宣傳利器，前者著重知識女性，後者則是專攻基層的口頭宣傳。值得注意的是：文字與口頭宣傳其實並非涇渭分明，這體現婦工會本身節省資源的特性。除了《婦友》刊有基層黨工的工作紀實之外，該刊其實同時也是宣傳員「人手一冊」的宣傳資料，在 1956 年即已發給宣傳員達 12,100 冊。[87] 換言之，婦女宣傳員所使用的文字資料，即是對外公開的機關刊物《婦友》、中央婦工會按月發給內部轄下宣傳員的〈宣傳網指示〉以及臨時性的宣傳資料。足見，宣傳指令稿源廣泛，卻上下一貫，同時機動性強，適合隨時應用於常態性及突發性的各種宣傳情境。

（三）婦女宣傳員的選任與訓練

婦女宣傳員雖不支薪，但仍有一定遴選標準，即：「以婦訓班各期結業研究員，與黨性堅強的優秀婦女黨員，及革命實踐研究院各期結業女研究員爲對象，同時並廣泛羅致人才」。[88] 可見「婦女宣傳網」既然是四大工作，宣傳員的選任自有標準，但礙於係屬免費且基礎的勞力，徵才誘因有限，因此「廣泛羅致人才」條款在實際上才是宣傳網的主要成分。也因此，選任方式多元，確實呼應走向基層的調性與主打親民的策略，其菁英氣息遠不如理論上濃厚：

> 選拔義務幹事和宣傳員的方法，不是用考試，也不是用甄審，而是由婦工組的同志們，一面訪問婦女同志，從訪問接談中瞭解同志們的思想、志願，和見識、

[87] 秘書處計畫檢查室編，《中央委員會各單位四十五年度中心工作報告表》（出版地不詳：秘書處計畫檢查室，印行年不詳），頁 32-33。

[88]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工作幹部手冊》，頁 31。

> 能力，並徵求同意。願意為黨服務的才考慮聘請。……現在聘任的義務幹事和宣傳員同志，大都經過這種選拔辦法而膺選。[89]

以上可見，這群爲數龐大、志願效勞的宣傳員大軍，主體並非嚴格考選而來，「願意爲黨服務」才是實際上的最高原則，如此亦確實更可以適應「宣傳到家」的基層語言與鄉土情誼，也有助於人員的擴大招募。

婦女宣傳員來源豐富而廣泛，同樣仍有職前訓練的規定，但是是採用簡易短期的講習會或座談會，以速成的集訓課程確保人員適應工作，有別於爲期 1.5 個月或 3 個月的「婦女幹部訓練班」。1956 年婦工會曾爲志願性質的黨工開展「義務幹事分期講習」制度，並於分配工作前稍加訓練；1959 年 5 月則推出更具系統性的「基層幹部講習會」制度，統合調集各鄉鎮的基層婦女幹部，並以 1 個月爲學期單位。[90]

同爲義務性制度的義務幹事與宣傳員，自然也被視爲「婦女基幹」，受訓教材一體適用，主要受訓方式由中央婦工會責成各縣市婦工組籌辦講習會，一年一度。課程內容在各地不盡相同，主要著重題綱探討、技術研討與演習實作，中央婦工會也會下鄉巡講，同時接受問答與視導情況。[91] 從受訓方式就能發現「婦女基幹」差異不大，義務幹事與宣傳員同受訓練，在實際分工邊界上，更隨著經費與人力的匱乏而日漸模糊。舉例而言，若地方黨部承辦任何活動或訓練

---

89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黨員集訓教材》，頁 66。

90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工十年》，頁 25-26。

91 楊百元，〈婦女基幹的訓練高潮〉，《臺灣黨務》（臺中），期 202（1959 年 6 月），頁 19-21。

班，支援人力常是義務幹事與宣傳員，分別不大，通力合作。[92]

圖 2　1960 年國民黨彰化縣婦女義務幹事、婦工宣傳員座談會[93]

三、婦女宣傳員的工作實踐與性別形象

（一）婦女宣傳員的宣傳內容

談完婦女宣傳網的建置與宣傳員的選訓後，則需探討的是該宣傳網究竟是「宣傳」些什麼？可惜的是，受限於婦工會內部檔案並不對外開放，我們無法完整取得〈宣傳網指示〉，但透過《婦友》與訓練教材等公開史料，仍能窺見概梗。1959 年婦女節，錢劍秋在《婦友》刊登工作報告，為其建設的「婦女宣傳網」的宗旨與成果向外界公開說明：

92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黨員集訓教材》，頁 79。

93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工十年》，頁 30。

> 尤其應著重基層宣傳，婦女們生活重心在家庭，故家庭宣傳，更為重要。婦工宣傳網乃適應這個需要而建立，數千婦女宣傳員遍佈於全省各里鄰，運用各種宣傳方式，展開宣傳到家的工作，喚起每一家庭的婦女均有敵愾意識，並以座談會等方式，闡揚反共抗俄國策，揭發俄帝共匪暴行……。[94]

錢劍秋呼應黨中央「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宣傳戰號召，在「重視基層宣傳」的正當性下，再度強調婦工會在國民黨「婦女機關」的特殊位置，因此主責「家庭宣傳」除了再適合不過，恐怕也只有婦女宣傳員能操持。尤其，農村婦女更被婦工會視爲保守，因此「更非婦女不能深入」，[95] 男女授受不親，傳統家庭又具隱私性，婦工會試圖建立同爲女性間情誼與對話的閨中平臺，推動政治宣傳自然容易使人信賴，完成「宣傳到家」的目標。

然而，「闡揚反共抗俄國策，揭發俄帝共匪暴行」等看似充滿戰鬥意識的宣傳口號，在實際操作上容易流於呆板。對多數家庭主婦而言，此類政治語言遙遠抽象，也對日常生活的經營毫無幫助，更難轉化爲政黨動員的具體效益。因此，根據當時的訓練教材，婦女宣傳員的實際任務遂轉向「組織、訓練與服務」三大面向，並在其中靈活融入宣傳內容，藉以淡化政治說教的色彩，提升婦女宣傳工作的親和力與可行性。

---

94 錢劍秋，〈十年奮鬪的成果〉，《婦友》，期 54（1959 年 3 月），頁 4。

95 「四十六年度黨務工作會議紀要」，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號會 7.1/94。

首先，在組織上，婦女宣傳員要擁護同黨女性候選人投入並贏得黨內要職、各級民代與地方自治單位等黨職與公職的選舉，達成為黨扶植女性參政、產出有利於女性政策的願景。再者，婦女宣傳員還需協助訓練基層女性，並推動國語識字運動，透過在鄉村與民眾服務站協同建立 4 個月的免費課程，對失學婦女進行基礎常識與語文補習，時不時導入精神講話與政治宣傳。就服務而言，「以服務代替宣傳」始終是婦工會的強項，更是滲透女性群體的溫情工具。[96]

事實上，1949 年前後國民黨婦女工作常用「以服務代替宣傳」手法對知識女性進行政治宣傳，這也是學界重視的課題。除了前述學者游鑑明注意到《婦友》兼具反共宣傳與服務女性菁英的文藝特質，學者呂芳上也曾論及中日戰爭時期的婦女刊物常闢讀者信箱與軟性專欄，在僵硬的政宣版面外，滿足戰時女性讀者仍存在的婚姻、教養、醫藥、娛樂，乃至於職業介紹等實際需求與對話空間。[97]

因此，在知識女性受眾之外，1950 年代的婦工會顯然也必須在這種「上有業務壓力」與「下有家務壓力」的夾層之間，平衡官方的反共論調與婦女的實際需要，這反映於國民黨中央熱衷在基層開展的民眾服務，並在服務過程培養對黨的向心力。1956 年黨中央的工作檢討報告，即已在改進方向點明：婦女宣傳員與義務幹事的訓練教材除了政治課題外，也該納入家政、育兒與增加副業能力等內容，才能「應婦女

---

96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黨員集訓教材》，頁 77-80。

97 呂芳上，〈抗戰時期中國的婦運工作〉，收入《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一輯，頁 397。

同志之需要」。[98] 以 1950 年代臺東縣黨部婦工組為例，她們直接任婦女宣傳員進入動員月會與村里大會講演，「傳達政令並宣揚三民主義，以及介紹衛生常識等」，足見政治性與實用性兼具的宣傳特色以及重視婦女實際需求、提供民眾生活知識的服務。[99]

同樣地，「提倡家庭副業，發展生產事業」始終被婦工會視為要務之一。[100] 以由國民黨與婦女會在板橋合開的「臺北縣婦女家事補習班」為例，該班透過提供「造花，編織，縫紉」等家事手工藝訓練，兼顧「婦女最熟悉的是家事，最需要是家事常識」的形象塑造，以及為國家貢獻戰時生產與出口經濟的宣傳話語。[101] 若從冷戰體制的觀點而言，政府鼓勵家庭主婦們投入副業生產、支撐家用，亦非臺灣特例，反而是反映反共陣營下臺美政府共享的「冷戰母性主義」。[102]

當然，更為直接的政治宣傳也不時出現在非政治性的服務工作上，以 1954 年 11 月開班的「桃園縣婦女手工藝講習班」為例，除傳授縫紉、刺繡與編織外，桃園縣黨部更毫不避諱「每星期增加一小時國際現勢與三民主義課程」，「加強思想訓練」。[103] 同樣地，臺南新豐紡織廠的黨部更分別

---

98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印，《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四十五年度上半年工作檢討結論》（出版地不詳：印行年不詳），頁 20-21。

99 婦友社編，《自由中國的婦女》，頁 49。

100 中央婦工會的工作成果〉，《婦友》，期 87（1961 年 12 月），頁 10。

101 本刊記者，〈台北縣婦女家事補習班〉，《婦友》，期 16（1956 年 1 月），頁 7。

102 有關臺美政府共享的「冷戰母性主義」，請見陳佩甄，《冷戰的感覺結構》，頁 103-107。

103 何寶珍，〈桃園舉辦婦女工藝講習〉，《臺灣黨務》（臺北），期 94（1954 年 12 月），頁 61-62。

在 1954 與 1955 年舉辦免費進修的臺語、英語與國語等語言補習班及縫紉補習班，「一方面培養員工職業技能，一方面爲本黨作很實際的機會宣傳」。[104]

以上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力圖平衡婦女謀職與國家統制的雙向需求，在忠黨愛國的政治宣傳聲中，達成國家對婦女的物質與精神動員，要其忠於國民黨，卻也使女性得以藉機提升語文、家政與專業能力，有助其在家庭內外的社交與謀生。

若再對照前述 Elaine Tyler May 的「家庭／國內圍堵」（domestic containment）觀點，婦女宣傳網雖在形式上淡化國民黨既有的反共宣傳語言，轉而強調婦女家務應用與家庭生活需求，但其背後仍體現冷戰格局下反共陣營所強調的家庭穩定與國家安全之連結。[105] 換言之，透過婦女工作將政治理念轉化爲家庭倫理與日常實踐，正是冷戰時期政治秩序滲入私人生活的具體表現。

（二）婦女宣傳員與義務幹事的服務工作

論及婦女宣傳員爲了政治宣傳而積極投入的服務工作，自然不能忽視婦女義務幹事們的鼎力相助。誠如前文，婦女宣傳網與婦女義務幹事制度同爲婦工會首創的姐妹制度，二者相輔相成，更互相合作，但人力分配與業務分工在 1962 年前是有分別的。以 1955 年上半年國民黨中央內部的

104 陳東，〈職業教育在新豐紡織廠〉，《臺灣黨務》，期 100（1955 年 3 月），頁 53。

105 Elaine Tyler May,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p. 203.

工作檢討報告來看，全臺人力爲 2,347 位義務幹事與 825 位宣傳員，兩者相差近 2.8 倍，差距懸殊。其業務性質起初亦確有不同：

> （筆者按：婦女義務幹事）主要任務，為舉辦家庭訪問，根據訪問結果，針對需要，分別舉辦服務工作，並按行政區域，分配義務幹部駐點，俾能全面展開工作下鄉之計劃。（筆者按：婦女宣傳員）按行政區域，配設於各鄉鎮，按月依照中央頒發的宣傳網指示（筆者按：資料），協助推行宣傳下鄉工作，並深入各個家庭。[106]

由上可知，婦女宣傳員專精於第四室宣傳業務的基層布達，尤其重視「家庭宣傳」；而婦女義務幹事制度則建立較早，業務更多元，舉凡調查訪問、服務活動等各種地方婦工單位主要的基層業務，以及在國語識字班、手工藝補習班、農忙托兒所，皆能見其服務婦女的身影。

無論是基於起跑時間或責任業務，婦女義務幹事與宣傳員制度雖獨立平行，但前者基於人多優勢、訪問工作使其易與地方熟識以及在訪問與服務時可藉機爲黨宣傳等因素，[107]從而使二者業務在推展上漸趨類似，越形重疊。早在 1955 年 5 月通過的〈婦女工作會鄰里幹事服務要點〉即將「宣傳」納入以「訪問」爲本的義務幹事業內。[108] 因此，此二制度

---

106 「中委會四十四年度上半年度工作檢討結論」，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號會 7.1/78。

107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黨員集訓教材》，頁 81-82。

108 「七屆中委會工作會議第 130 次會議紀錄（1955 年 5 月 05 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國民黨〉，檔號會 7.4/130。

亦不斷受中央呼籲互相兼任、物盡其用，[109] 並終於在 1962 年後，以「節省經費，簡化手續」爲由，使「義務幹事則均兼宣傳員」制度化，婦女宣傳網形同併入婦女義務幹事制度，第四室也不再獨立製發宣傳資料，隔年更不再負責基層宣傳員工作，象徵婦女宣傳工作已然完全融入女性化的社區服務。[110]

圖 3　由婦工會義務幹事主持的農忙托兒所照片 [111]

然而，雖然這些女性義工名義上隸屬於國民黨系統，但婦工會基層力量薄弱卻是不爭的事實。其工作網絡雖遍及全

109　錢劍秋，《經驗的歷程》，頁 11。

110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工十年》，頁 89；中央婦女工作會編，《重要工作報告》，頁 6-7。

111　〈本會義務幹事主持下的農忙托兒所〉，《婦友》（臺北），期 127（1965 年 4 月），無頁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臺，卻同時肩負服務與宣傳任務，必須仰賴地方人脈經營民心。相較之下，早在日治時期即活躍、並在戰後受婦工會輔導的臺灣省與各地婦女會人士們，無論在人員、理念或運作上都與各地婦工單位高度契合，也因此形成密切的合作關係。憑藉雄厚的在地基礎與成員對地方事務的熟稔與老練，許多地方婦工組的義務幹事在服務工作上得以借重各地婦女會的資源與經驗，而後者往往早已在基層展開相關活動，實際上扮演關鍵角色。[112]

1955 年 4 月，錢劍秋率隊視察中北部各縣市婦女工作時指出，各地婦女組織多已自發投入社會服務，例如：桃園縣（今桃園市）與新竹縣婦女會理事長各自出資開辦幼稚園，陽明山（今臺北市士林區與北投區）婦女會則「運用組織力量」配合當地農會設立農忙托兒所，婦聯空軍分會臺中支會更「出錢出力舉辦幼兒園十三所」。這些舉措與婦工會雲林縣婦工組所推動的縫紉班並列，顯示當時地方上婦女組織間的界線模糊，共同拓展服務的情形十分普遍。[113] 相較於以黨務爲主的婦工會，具有在地網絡與實務經驗的婦女會更傾向以服務方式經營地方，並在理念與需求上與婦工會契合，提供合作與工作的平臺。

另一方面，若從黨的組織層面觀察，這些義務性投入黨

112 以農忙托兒所、識字班與職訓班為例，育兒在 1946 年成立的省婦女會早受關注，因此該會早已為減輕各農業縣市的農婦們壓力而廣設農忙托兒所；同樣地，識字與手工藝等班務也都是省婦女會組訓組自 1940 年代起的重點業務。參考自吳雅琪，〈臺灣婦女團體的長青樹〉，頁 126-127、160。

113 「七屆中委會工作會議第 127 次會議紀錄（1955 年 4 月 22 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國民黨〉，檔號會 7.4/127。

務與社會服務的婦女幹部，無論身處前線島嶼或偏遠山區，皆勞苦功高，足跡遍布各地，對婦工會的基層化發展貢獻卓著。中央婦工會多次在報告中表達感佩，稱她們「實實在在地做到了民眾與政府的橋樑」。[114] 特別是在 1950 年代國民黨陸續推動「民眾服務站」制度後，婦工會除了進一步結合義診、職訓、托兒等多元服務項目，更直接承辦具家庭副業性質的髮網編織班，在基隆、新竹等地開班授課。[115] 此類實踐不僅深化婦工會的基層滲透力，也使婦女義務幹部與婦女宣傳網逐漸成爲連結黨政體系與地方社會的關鍵樞紐。

圖 4　婦工會主辦的家庭婦女髮網編織班[116]

根據曾任臺灣省黨部主委的薛人仰所言，國民黨中央熱衷於基層服務，委由省縣市黨部主持各縣市的各級黨部，每年籌劃與舉辦「聯合服務」。從服務內容而言，舉凡訪問、

114 〈一年來的婦女〉，《婦友》，期 39（1957 年 12 月），頁 2。

115 「民眾服務站」為國民黨區級黨部對外活動之實質機關，最早始自 1952 年普設於全臺各鄉鎮市，該站由區黨工兼任組成，站主任則為區黨部書記擔任，採黨站合一的模式經營，可視為國民黨在鄉鎮市區的基層機構。任育德，《向下紮根》，頁 128、233-244。

116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工十年》，頁 47。

醫療、文化康樂、生活與生產，包含：家政指導、婦嬰保健、義診施藥、砂眼防疫、妊娠接生、歌舞表演、放映電影、手工藝指導等，[117] 服務廣泛且貼近家庭，有些更與私密的女性身體有關，自然需要借重這些婦女義工才能有效推動。

事實上，中央婦工會在 1956 年進一步創設「婦女之家」，並於全臺各縣市設立分部，提供婦幼保健、家訪衛教與生活知識培訓等多項服務，對改善貧病大眾的生活條件與推動臺灣公共衛生事業，均有實質貢獻。在這些工作中，婦女義務幹事即扮演關鍵角色，與專業醫護人員、社福專家及黨務幹部並肩合作，投入地方服務與公益行動的同時，亦實現政治宣傳與政黨輔選的雙重功能。[118]

正因婦女工作長期被視爲更貼近在地社區，講求基層服務，因此早在婦工會成立前，國民黨早已將婦女運動的推展交由省黨部執行，可見婦女工作與臺灣在地化的關係並非偶然，反而反映出國民黨在組織策略規劃上長遠的性別意識，女性群體的天職再度被復刻爲穩定反共後方的戰時家園，婦女工作與臺灣環境的維護關係密切。[119] 隨著婦女義務幹事與宣傳網制度先後上路，臺灣省黨部也承擔選訓這兩群義工的執行角色，確保這項國民黨滲透臺灣的工程能順利進行。[120]

---

117 薛人仰口述，遲景德、歐素瑛訪問，《薛人仰先生訪談錄》（新北：國史館，1996），頁 88-89。

118 關於中央婦工會的「婦女之家」，請見游鑑明，〈國民黨走向家庭〉，《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7，頁 191-264。

119 「七屆中委會工作會議第 5 次會議紀錄（1952 年 11 月 25 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國民黨〉，檔號會 7.4/5。

120 「七屆中委會工作會議第 232 次會議記錄（1957 年 6 月 06 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國民黨〉，檔號會 7.4/232。

因此，1950 年代中後期，婦工會曾試圖師法中共「發起運動，鼓動熱潮」，由義務性的婦女宣傳員在廣布全臺的婦女宣傳網，推動移風易俗的年度宣傳運動週。[121] 其宣傳題目因地制宜，可見本土化與服務性遠大於政治性的宣傳風格。本文根據錢劍秋在 1961 年臚列的年度「宣傳運動週」，以《婦友》與各報紙所載明的日期，彙整如下：

表 1　1950 年代臺灣婦女界的「宣傳運動週」列表

年分	運動名稱	運動週次
1954-1955	改善環境衛生清潔	1954.12.22-28（臺北）、 1 月起（全臺）
1956	保護養女	1956.06.11-1956.06.17
1957	請勿隨地吐痰	1957.06.14-1957.06.20
1958	拒讀黃黑書刊	1958.06.19-1958.06.25
1959	幸福家庭	1959.02.23-1959.03.08
1960	改進家庭教育	1960.06.24-1960.06.30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整理自《婦友》、《中央日報》、《民聲日報》各期報導。

從這些由婦工會主導的宣傳運動來看，主題並不完全圍繞反共，反而更著重推廣配合政策的社區服務與家庭治理等實用知識。這呈現婦工會組織特色，並試圖展現其「臺灣性

121　趙文藝，《婦女黨員組訓技術》（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54），頁 25。

格」，也反映婦女工作與省級黨政單位的合作傳統。以 1957 年請勿隨地吐痰運動爲例，即是婦工會協助衛生單位推動，並由該會訂頒「婦工宣傳網工作資料第二十一號」，直接指示隸屬於各級黨部的婦女宣傳員深入城鄉宣導與衛教服務，透過家庭婦女們完成維護環境衛生、治理家園與改革社會風氣的目標。[122]

然而，此種看似去政治化的動員模式，亦同樣與同期美國冷戰政治宣傳中對女性責任的想像呈現相似邏輯。正如學者 Diana Cucuz 觀察，冷戰時期女性常被賦予以母性特質爲基礎的公共責任，並透過家庭延伸至社區的志願服務參與公共事務。[123] 由此角度觀之，婦女宣傳網所推動的家庭宣傳與社區服務，亦可理解爲冷戰性別政治在地方社會中的具體實踐。

誠然，婦工會身爲國民黨的直屬機構，各項業務當然無法脫離政黨利益的算計，反共抗俄與掌握選情仍是指導原則，但守衛鄰里與治理家庭的女性形象與社會責任根深蒂固，反而使婦女宣傳工作擺脫僵化的政黨宣傳。因此，相較於中央黨部其他組會，婦工會借重雙重義務幹事制度的全臺布建，「以服務代替宣傳」，強化國民黨在臺灣基層的社會滲透，也務實地深化與臺灣在地社群的聯繫與籠絡，成爲黨國體制走向臺灣基層的重要路徑，更貼近本土民眾的實際需求。

---

122 「七屆中委會工作會議第 234 次會議記錄（1957 年 6 月 27 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國民黨〉，檔號會 7.4/234。

123 Diana Cucuz, *Winning Women's Hearts and Minds: Selling Cold War Culture in the US and the USSR*, p. 63.

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民眾服務站」效果不宜高估。綜合學者張玉法（1935-）的憶述及任育德的研究皆指出，這類基層服務與選務交纏的方式易流於形式，實際工作常是選前才服務，績效不佳、作風官僚、態度更是高高在上，使 1950 年代國民黨接近群眾仍有限度。[124] 不過，婦女宣傳員與義務幹事重在志願參與，且與各地婦聯會與婦女會等民間婦團常態合作，服務貼近家務與女性生命，難以中輟。再者，強調私人連結的聯誼網絡，輔以龐大而成熟的組織能量與情感動員，其實效與影響力是否有別於受薪辦事的男性黨工們，確有商榷空間。[125]

最後，綜合上述分析，我們不禁進一步追問：在資源相對匱乏、待遇有限且仍須面對男性黨員性別偏見的情境下，這些婦女義務幹事與宣傳員何以能長期投入並認真志願參與？以 1954 年任職於汐止區黨部的周敏（1929-）為例，她曾透過國民黨舉辦的義務幹事訓練課程，習得黨政知識並培養演說技藝。因此，此後無論遷居何地，她皆主動前往當地

124 以上研究觀點與學者張玉法的說法皆收錄於任育德，《向下紮根》，頁 242-244。

125 以戰後臺灣婦團長年推動減輕農工家庭負擔的托兒服務為例，即屬難以中輟且與時俱進的長期任務。一直到 1974 年，電視名人薇薇夫人在其熱門報紙專欄指出：工商社會轉型下職業婦女已普遍，托兒設施發展為社區母親們排班支援、並與幼教人員搭配的合作模式，降低成本也配合職業婦女作息，但薇薇夫人仍點出全臺卻幾乎只有婦工會開辦，明顯供不應求，並呼籲「有力量的單位」應多增設。此見婦工會服務仍有一定的實質影響，且婦女工作者適應都市化轉型，審時度勢、調整模式，照顧婦女需求，並非虛與委蛇。參考自〈薇薇夫人專欄：多成立合作托兒所〉，《聯合報》（臺北），1974 年 10 月 11 日，第 6 版。

婦工組協助。[126] 此例顯示，婦工組織所提供的不僅是政治動員的場域，同時亦可能成爲女性自我培力與社會連結的契機，加強投入動機。[127]

（三）婦女宣傳員的工作形象與性別特質

接著，我們將焦點置於婦女宣傳員的宣傳業務本身。婦女宣傳員專攻口頭宣傳，柔美的聲線與被觀看的身體顯然是其性別身分的重要環節，考驗她們吸引群眾目光與信任的能耐。無獨有偶，根據國民黨不分性別的基層黨工教材，也直接在「口頭宣傳」的課題上，理所當然地直接點明「最好用女性任廣播員」，才能達到吸引聽眾的效果。[128]

從黨工投稿來看，更可窺見婦女宣傳員的工作實況。1957 年 3 月，彰化縣婦工組派出婦女宣傳員組織巡迴宣傳隊，下鄉至彰化市區、花壇、大村、員林、永靖、田尾與北斗等地進行政治宣傳，再度復刻國民黨在中日戰時的宣傳經驗，只是反對對象從日本轉爲中共。宣傳隊以「揭露共匪對大陸婦女暴行」爲主題，結合戲劇與歌唱表演，更將流行歌曲改編爲反共歌謠，以吸引群眾駐足觀賞與學唱，藉此凝聚鄉間的反共意識。[129] 其演唱曲目包括彰化縣婦工組自編的

---

126 周敏，《周阿姨的故事：走過歷史現場：1937-2011》（臺北：商周出版，2011），頁 148-153。

127 當然，本文並不意圖將婦女工作者們的參與動機化約為單一模式，而是嘗試透過具體個案，揭示其在意識形態認同、個人發展機會與社會網絡連結之間所交織的多重動因。

128 中興山莊編，《基層黨務工作的方法》，頁 130-131。

129 楊百元，〈記彰化婦工宣傳隊〉，《婦友》，期 32（1957 年 5 月），頁 7。

〈大陸姊妹〉與〈大陸苦〉兩首，並同時散發 3,000 份宣傳資料。[130]

值得注意的是，婦女宣傳員以臺語表演反共悲劇，顯示其宣傳策略並非形式化的口號傳達，而是有意識地貼近臺灣鄉土，使觀眾更易進入劇情、產生共鳴。根據黨工劍瑩的紀錄，宣傳員還會親自下臺教唱，促進與地方婦女的互動交流。這種以女性爲主體、結合情感與娛樂的軟性宣傳形式，充分發揮女性溫柔敦厚、感性動人的婉約形象，不僅強化宣傳成效，也讓宣傳員們獲得難得的展演舞臺，並展現女性情誼與政治動員並行的現場實況。

此外，以上報導也提及臺語表演成功，「有的從大陸來的同胞流下了眼淚，本省婦女同胞不禁也跟著傷感起來了」，[131] 更可見婦女宣傳員聲淚俱下，跨越族群與語言藩籬，以情感動員達成政治傳播。事實上，這不僅反映婦女宣傳工作的活潑創意與在地化特質，也反映婦女實際面對的生活情況與睦鄰紐帶，都使婦女宣傳員更能擺脫既有男性黨工的優越心理與宣傳困境，展現婦女宣傳工作講求私人連結與深入臺灣婦女生活的性別特色，有別於其他男性爲主的基層宣傳工作。[132]

---

130 劍瑩、毛仁民、旭昇，〈婦女同志熱心可嘉 展開宣傳服務工作〉，《臺灣黨務》（臺北），期 150（1957 年 4 月），頁 33。

131 劍瑩、毛仁民、旭昇，〈婦女同志熱心可嘉 展開宣傳服務工作〉，《臺灣黨務》，期 150，頁 33。

132 學者任育德觀察到，1950 年代許多以外省籍為主的區級幹部受制於優越心態與消極態度，不願也不諳當地語言，欠缺誠意也宣傳不力，更凸顯本文這群出身基層、背景多元的婦女宣傳員的難能可貴與性別差異。同樣地，一般不住眷村的外省婦女也確實常因家庭生活與社交需求，積極學習臺灣話，努力融入當地社群，張王銘心與余文秀等人皆

活躍的婦女同志担任宣傳員

本黨的婦女同志在各地擔任宣傳員，她們熱心自願爲民服務，她們散佈在每一個鄉鎮，足跡更踏遍前線。她們是中央婦工會宣傳網的健將，這個網現已遍佈全省。本頁都是婦女宣傳員的活動鏡頭。

這位郵電界的婦女宣傳員江瑞雲，能歌善舞，上面兩張照片是她隨郵電界勞軍團在前線慰勞將士歌舞時留影。

這位彰化縣的婦女宣傳員黃瓊霓被選爲該縣和美鎮里民大會的主席，她正在致詞，這個里民大會是參加競賽的。

民衆出席大會，靜聽婦女宣傳員報導匪情。

圖 5 「活躍的婦女同志担任宣傳員」報導[133]

同年 10 月，《婦友》刊登「活躍的婦女同志担任宣傳員」圖集（請見圖 5），影像化呈現婦女宣傳員的活動情況，使我們能更直觀地理解她們在身體表現與宣傳風格上的性別特徵。圖中所塑造的婦女形象強調活潑大方的女性身體，展現兼具柔性與動感的政治美學，如：郵電黨部的江瑞雲，以「能歌善舞」介紹其舞姿；又如：彰化和美的黃瓊霓，則報導其熱心社區事務，善用村里民大會爲宣傳舞臺，符合訓練內容。

以上這些例子不僅顯示婦女宣傳員靈活運用地方資源、節省成本的實務智慧，也反映她們以創意與親民姿態，發揮女性特質在政治宣傳上的獨特優勢：以感性、表演與身體魅力，或是溫情喊話等形象構築情感動員之效。

屬此例。她們曾在訪談時表達與社區臺籍婦女的珍貴友誼，臺語流利的張王銘心更自豪地表示其公務員夫婿反而不識臺語。參考自任育德，《向下紮根》，頁 205-206；王張銘心口述，游鑑明訪問，黃銘明紀錄，〈王張銘心女士訪問紀錄〉，收入《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91-94；余文秀口述，游鑑明訪問，陳千惠、張成瑋、游鑑明紀錄，〈余文秀女士訪問紀錄〉，收入《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錄》，頁 144-145。

133 〈活躍的婦女同志担任宣傳員〉，《婦友》，期 37（1957 年 10 月），無頁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必須注意的是，婦女宣傳員之所以能在基層宣傳中發揮宏效，與女性身體與聲線長期被性別化的表演期待密切相關。女性被視爲善於抒情、親和、柔軟且能觸動情感，這些特質在國民黨婦女宣傳體系中被策略性地轉化爲政治資源。婦女宣傳員藉歌舞與情感交流塑造出活潑而端莊的理想女性形象，不僅與男性主導的官方宣傳形成明顯區隔，也強化其作爲「宣傳下鄉」與「宣傳到家」的情感功能。換言之，婦女宣傳網的性別特質並非偶然，而是被制度化地用以調和政治教條與家庭倫理，讓政治滲入私人生活的日常層面，納入黨國親民治理的關鍵環節。

正是在此長期服務與情感互動的基礎上，婦女宣傳員得以逐步累積與基層婦女及社區民眾間的信任感與連帶感。這種親近日常而富含人情味的社會連結自然有助於政黨動員的推展；下文所討論之「婦女票」，即可視爲此種潛移默化效果的具體展現與驗證。

最後，學者洪郁如曾指出，日治時期女性菁英已透過地方層級的皇民化運動建立公共參與的經驗與聲望。這些臺籍女性在動員社區與配合國策宣傳的過程中，獲得暫時脫離家庭束縛、建立社會網絡的機會，亦藉此累積地方影響力。這種以服務爲名、政治爲形的公共活動，使她們在戰後能順勢轉入婦女組織並參與地方公共事務。[134]

同樣地，在 1950 年代，許多家庭婦女也能運用政治語言爲正當性依據，藉參與婦女宣傳網與各項社會服務，拓展家外的活動空間，獲得自我實現與社會認可的成就感。不過，縱然有實踐自我的能動性，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這些

[134] 洪郁如著，吳佩珍、吳亦昕譯，《近代台灣女性史》，頁 397-399。

活動本質上仍是政治性的工作，女性先天的生理特質與後天的刻板印象，皆深受父權社會與政治宣傳的觀察與動員。

四、婦女宣傳網的應用實例：以輔選工作及八七水災賑災為例

（一）1950 年代婦女宣傳網的輔選工作

戰後初期，臺灣啓動鄉鎮層級的民代直選，以及省縣市參議員的間接選舉，之後又陸續有國民參政員、制憲國大代表、第一屆國大代表、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等中央民意代表的間接或直接選舉。[135] 隨著中樞遷臺後，爲了爭取國際支持與滿足島內菁英的參政呼聲，又陸續開放臺灣省級以下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及臺灣省議員的普選，落實地方自治並定期改選，取得內部正當性。[136] 爲使國民黨掌握公職人員與地方治理的正當性，免費爲國民黨建立基層網絡的婦女義務幹事與宣傳員最現實的成果、最被讚譽的績效，自然當推「爲民服務對於選民具有影響」，延續國民黨執政的地方壽命。[137]

日治時期以來，在追求現代化的殖民政策下，女子教育與新興職業興起，逐漸改變臺灣社會風貌，也使得女性有機會參與社會發展與公共事務，更讓各地的菁英女性在戰後憑

135 李筱峯，《臺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臺北：自立晚報，1993），頁 13-43。

136 薛化元，《臺灣開發史》（臺北：三民書局，2022），頁 224-226、232。

137 楊百元，〈彰化的婦女動員〉，《臺灣黨務》，期 153（1957 年 5 月），頁 17。

著長期累積的專業能力與地方知名度，陸續投入各項選舉與公職職務。[138] 因此，早在戰後初期，臺灣女性即已表現出一定的教育水準與普遍的職場生活，不受制於家內，一度使初來寶島洽公或旅行的中國官員及文人大開眼界。[139]

奠基於此社會背景，臺灣女性參政風氣雖不宜高估，但若置於 1949 年前的時空來看，確實足稱進步：在臺籍選額有限的情況下，有高達 9 位菁英女性在中央與地方各級民意代表選舉上脫穎而出，同時再有 4 位女性取得候補資格，這無論是女性的政治實力，抑或臺灣社會的接受程度，都值得矚目與重視。[140]

1950 年代，國民黨政府雖部分凍結憲法的選舉規定，限制中央民代的改選慣例，但婦女保障名額的憲政條款卻獲保留，[141] 並在不同層次的選舉上發揮功能，一定程度上提供各地臺籍女性菁英躋身政壇的門票。[142] 隨著女性參政日顯

---

138 游鑑明，《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2），頁 426。

139 游鑑明，〈當外省人遇到台灣女性：戰後台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7（2005 年 3 月），頁 179-182。

140 李筱峯，《臺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頁 72-75。

141 Huang Chang-ling, “Strength in Numbers: Increasing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in Wei-hung Lin and Hsiao-Chin Hsieh, eds., *Gender, Culture & Society: Women’s Studies in Taiwan* (Seoul: Ewha Woma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79-281.

142 像是來自北港的女性菁英林蔡素女（1903-1993）就是因為「婦女參選有保障名額」的因素，受到身邊親友「見我頗外向，又能做事」鼓勵下在 1950 年領表參選縣議員，就此踏入政壇，並歷任省議員與監察委員等多項民選職務。請見林蔡素女口述，游鑑明主訪，吳美慧紀錄，〈林蔡素女女士訪問紀錄〉，收入《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頁 152-153。

積極，以及選制明文保障，如何鼓勵女性選民把握投票權是國家目標，而如何讓選民票投國民黨則是政黨任務。

因此，婦工會指導長宋美齡曾對各縣市女性投票率過半的婦工組親頒獎勵機制，[143] 而婦女宣傳網更在增進婦女行使投票權上全力以赴，以 1957 年臨時省議員選舉暨縣市長選舉為例，女性選票已占全臺總票數的 49.3%，其中在 10 個縣市甚至衝破 50%、屏東縣更高達 60%，[144] 顯然形成重要票源，此對戰後臺灣選舉史上的「婦女票」文化影響深遠，這些穿梭鄰里與家戶的義工們自然功不可沒。[145]

婦女義務幹事與宣傳員隸屬於國民黨婦工會，一如學者游鑑明對同屬該會的婦女之家研究成果所示：在看似中性的民眾服務與政令宣導的背後，仍承擔著為政黨拉票的現實工作。[146] 因此，在宣導珍視投票權與參政權的同時，更要為國民黨吸納女性選票。這樣由女性擔綱重任，結合服務與輔選的宣傳模式得到國民黨重視，婦工會甚至位列國民黨內的輔選責任單位之一，顯見其低成本、高回報的基層動員已得關注。[147]

此後，婦工會轄下各級專任或義務幹事催票有功，穩定國民黨在婦女界的高支持度，並將此服務帶動選務的基層動

143 錢劍秋，《經驗的歷程》，頁 55。

144 〈一年來的婦女〉，《婦友》，期 39，頁 2。

145 「第八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 312 次會議紀錄（1961 年 7 月 15 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國民黨〉，檔號會 8.3/312；錢劍秋，〈婦女工作的回顧與前瞻（下）〉，《婦友》，期 175，頁 3。

146 游鑑明，〈國民黨走向家庭〉，《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7，頁 233-234。

147 科府，〈輔導本屆地方自治選舉的檢討〉，《臺灣黨務》，期 155（1957 年 6 月），頁 11。

員模式延續至 1950 年代之後；以 1990 年高雄市黨部的婦工業務爲例，更可見其一脈相承，甚至幾無二致。[148]

本文目前雖無法掌握 1950 年代輔選當事人的口述史料，但有鑑於模式的鞏固與延續，曾在 1970 年代任職於臺北縣（今新北市）各區黨部的婦女幹事詹碧霞（1949-）的證言亦可供參考。詹碧霞的輔選任務是挨家挨戶訪問選民，與縣內各地的婦女與農民打成一片後，爲國民黨籍的候選人博取支持與同情。她時而閒話家常，時而幫忙農婦餵豬撿柴，以女性身分逐步取得基層女性的信任，並在選舉時化爲選票，甚至還有女性選民在投票日交出印章與身分證並授權代投的非法情形。可見，這些婦女工作者們重在經營民心與信任，對國民黨競選實具驚人貢獻。[149]

不過，嚴格來說，輔選直接涉及地方政局，茲事體大，在婦工會內乃是由第一室與第二室主責，[150] 並非主管宣傳的第四室任務，故實際執掌婦女界動員工作者，並非婦女宣傳網。根據黨員教材指示，婦女界的輔選工作相較於其他人民團體「應特別注意」，並由當地黨部自各人民團體中直接挑選具有號召力的女性同志，單獨組成專責的婦女助選小組。[151] 以 1957 年縣市長與省議員選舉時的雲林縣黨部爲例，國民黨在縣級設有輔導會報，各鄉鎮設助選小組，各村里則設動員小組，並以此與黨部外的各界助選小組（包含婦

---

148 高雄市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高雄市委員會七十九年度工作計劃》（高雄：高雄市委員會，1989），頁 46-43。

149 詹碧霞，《買票懺悔錄》（臺北：商周出版，1999），頁 123-125。

150 游鑑明，〈國民黨走向家庭〉，《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7，頁 233。

151 中興山莊編，《基層黨務工作的方法》，頁 84-85。

女界）一同輔選。[152]

事實上，學者任育德就曾注意到國民黨透過遍及全臺的農漁團體與水利系統，以及青年、文教與宗教等各種人民團體凝聚選票，[153] 而在地方體系更爲複雜與健全的三大婦女團體上，更不可能例外。根據黨工周良的工作報告，1950 年代的國民黨雲林縣婦女助選小組即是由縣內各級婦女團體與地方女性名人共 20 多人組成，並由她們向下規劃、策動與領導各村里 10 多人的助選小組進行「家戶動員」，爭取家屬與鄰居們的選票。從同一份報告來看，婦女宣傳員的角色其實不在核心，反而較居外圍，她們主要支援「口頭宣傳」的部分工作：一如既往地運用村里民大會或是訪問服務民眾時藉機宣傳即可。[154]

然而，即便如此，婦女宣傳網的宣傳工作亦需要張本與指導，按表操課，重要性並不亞於專職黨工。根據錢劍秋的工作報告，婦工會在 1957 年 3 月製發、不對外公開的當月宣傳網資料（即宣傳網指示）即以「領導婦女選賢與能」爲主題，指導各級黨部的婦女宣傳員展開助選宣傳工作，除了要提升婦女投票率，更要「選舉本黨提名候選人」，省黨部則特別受到點名。[155]

152 周良，〈雲林縣展開了動員助選的高潮〉，《臺灣黨務》，期 150（1957 年 4 月），頁 11-13。

153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輔選動員機制之建立及其發展（1950-196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25，頁 86-90。

154 周良，〈雲林縣展開了動員助選的高潮〉，《臺灣黨務》，期 150，頁 11-13；周良，〈雲林的婦女動員工作〉，《臺灣黨務》，期 151（1957 年 4 月），頁 28。

155 「附件、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三十次幹事委員第十二次委員聯席會議紀錄」，1957 年 4 月 29 日，影印本。

接著，再從婦女宣傳網的公開教材來看，同年 4 月《婦友》也刊登對國民黨籍的臺北市長候選人黃啓瑞（1910-1976）的訪談、參選肖像與公差相片（請見圖 6），圖文並茂地暢談其從政理念、婦女政見、服務熱情與美滿家庭，以及因公返國後一家老幼接機的溫馨畫面，塑造勤政又愛家的公私形象，同樣便於婦女宣傳員引爲助選，作爲提供地方選民指認的宣傳媒材。[156]

值得注意的是，在鬆散的黨務結構與資源撙節的背景下，有志於公務的女性們參與選務，有人格特質、生命經驗與政治理念的個人實踐與自我考量，不可類比於中共組織、將其視同黨國體制嚴密控管與思想審查下的結果。除了前述義務幹事周敏的案例，再如前述的詹碧霞亦基於受黨栽培的知遇之恩，「粉身碎骨愛國民黨」，不僅參與作票與買票等舞弊行爲，更甘願在離職後還臥底對手陣營，暗助國民黨選舉操作。[157]

---

156 本刊記者，〈願全心全力為市民服務的臺北市長候選人：黃啓瑞訪問記〉，《婦友》，期 31（1957 年 4 月），頁 10。

157 詹碧霞，《買票懺悔錄》，頁 35、55-60、121-129。

圖 6　「黃啓瑞先生由歐美考察市政歸來」宣傳報導[158]

無可否認地，這些女性菁英有其熱心公務與實現自我的自主性與能動性，但在一黨獨大的時代情境下，活躍政壇的菁英女性們確實也選擇不多，國民黨的執政優勢與地方控制明顯具有不公平的吸引力。[159]

最後，學者游鑑明曾指出，國民黨婦女之家的受援婦女

158 「黃啓瑞先生由歐美考察市政歸來，其老母及宗人親友歡迎於機場。（中立老太太為黃先生七十八高齡老母）」，《婦友》，期 31，無頁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159 再舉例來看，林蔡素女即曾認為，雲林縣議員任期屆滿後決定在 1953 年競選臺灣省議員，即使具在地口碑與地緣優勢仍無法勝選，是因為她當時不具備國民黨籍，遂在敗選後轉投國民黨麾下，並在兩年後由國民黨協助配票後勝選。無獨有偶，戰前留日的羅東女醫陳石滿也提及：即使在當地懸壺多年，累積豐富人脈，但她認為自己能在 1950 年勝選宜蘭縣議員，還是因為「中國國民黨宜蘭縣黨部幫忙」。請見林蔡素女口述，游鑑明主訪，吳美慧紀錄，〈林蔡素女女士訪問紀錄〉，收入《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頁 154-157；陳石滿口述，游鑑明主訪，黃銘明紀錄，〈陳石滿女士訪問紀錄〉，收入《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頁 241。

藉輔選增進政治知識；[160] 而學者 Diana Cucuz 同樣也發現，冷戰美國的暢銷雜誌《女士家庭雜誌》（*Ladies' Home Journal*）倡導賢妻良母，卻也鼓勵婦女將家庭責任延伸至社區與政治領域，一度激發家庭主婦的參政熱情。[161]

由此觀之，本文所討論的婦女宣傳員以服務與聯誼取代政策討論的助選策略，雖帶有政黨意圖，卻也在實踐中對於基層婦女關心選務與累積政治經驗有所裨益。然而，這亦是父權社會對女性公共參與的刻板印象，炮製女性選民不問政事、偏重情感與情緒化的政治形象，更單一地強調其社會服務的母性特質與實際任務。如此輔選方式不僅國民黨採用，也在政壇與民間的組織文化中習以爲常地傳承下去，直至民主化後仍受用不已，綿延不絕，或許有值得我們省思之處。[162]

---

160 游鑑明，〈國民黨走向家庭〉，《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7，頁 235。

161 Diana Cucuz, *Winning Women's Hearts and Minds: Selling Cold War Culture in the US and the USSR*, pp. 46-51.

162 研究者鄭維鈞與郭佳臻都注意到民主化後的臺灣選舉，無論是 2000 年總統大選時遍布全國並支持民進黨的「水噹噹」婦女助選團體，抑或成立於 2001 年民進黨嘉義縣競選總部的「社團法人嘉義縣姊妹連線婦女權益協進會」兩個案例，都是承襲類似過去國民黨婦女組織的婦女助選模式。透過他們的觀察，這兩種團體當然不具備黨國動員的技術與特權，但卻同樣凝聚國族主義以求勝選，更透過與政黨合作，持續動員女性網絡，卻又刻意避談政治、強調社會服務，雖兼顧女性的政治賦權與選民動員，但運作邏輯與黨國時代的婦女組織並無顯著差異，甚至受到潛移默化，陷入「『反國民黨』與『仿國民黨』的掙扎」，反而與 1990 年代主張女性主體性與施壓政黨政策的婦運觀念漸行漸遠。參考自鄭維鈞，〈婦運脈絡下看政黨外圍婦女組織的限制與突破——以民進黨水噹噹助選團為例〉（臺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1 月），頁 132；郭佳臻，〈動員女性選民：嘉義縣姊妹連線的個案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2024 年 7 月），頁 32-38、91。

（二）八七水災婦女宣傳網的賑災宣傳工作

1959 年 8 月，八七水災重創臺灣中南部，暴雨連綿不止，洪水氾濫成災，造成嚴重死傷與交通中斷，震撼全國。面對突如其來的國家級天災，政府各部門迅速動員：國防部、警備總部與省政府等機關於 8 月 8 日下令軍警憲兵下鄉救災。[163] 災情之嚴重亦引起總統關切，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1898-1965）隨即召集省政府主席周至柔（1899-1986）及多位部會首長——包括經濟、財政、交通部門與美援會高層——共同研擬中央、地方與美方合作的全面救災方案。[164]

在此體現黨政合一特質的動員體系中，國民黨也積極展現執政黨的組織能量。臺灣省黨部指示受災縣市黨部全面投入急救與善後服務，而作爲基層聯絡樞紐的「民眾服務社」，遂宛如婦女義務幹事與宣傳員活躍的救災中心。省黨部明令「各種黨部與婦工組織發動同志展開捐募與服務工作」，使婦工會與其綿密的基層網絡得以在賑災系統中迅速反應與行動，展現其併行黨國動員與社會救助的任務專長與關鍵角色。[165]

根據官方 1960 年 9 月出版的災後資料可見，八七水災影響廣及 13 縣市、災民達 305,234 人，公私損失更達 3,742,358,000 元新臺幣。1959 年 8 月底，總統根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頒布緊急處分令，並由行政院正式組成救

---

163 〈搶救中南部大水災政府積極展開工作〉，《中央日報》（臺北），1959 年 8 月 9 日，第 3 版。

164 〈總統關懷中南水災 已飭三軍協助搶救〉，《聯合報》，1959 年 8 月 10 日，第 1 版。

165 「第八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 155 次會議紀錄（1959 年 8 月 19 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國民黨〉，檔號會 8.3/155。

災與重建小組，全力動員全國各級機關與軍民，先救災後重建，並在 1960 年 6 月底完成重建任務。[166]

災民救護與災區重建仰賴大量人力與物力，確實與「戰時」情況類似，這對處於動員戡亂體制且長期戰時宣傳的國民黨而言，不難操作，這當然也包含發起善款的捐募運動、塑造義不容辭的正當性，精巧地動員各方愛心。

1959 年 8 月 11 日，省政府與全臺各地的公私部門紛紛慷慨解囊，這在黨政一體的時代下，國民黨組織與公家單位及公營事業關係緊密，黨部密度高，除了桃園縣與高雄市等地方黨部在當日發起募捐外，[167] 自然也少不了隨國民黨組織向下滲透的產職業部門與學校單位，而這些機關如何發揮勸募與宣傳等災後工作，自然有賴如同身居戰時「後方」、熟諳社區工作的婦女工作者們。

因此，在全臺各級黨部與「四大單元」內的婦工單位、婦女義務幹事與宣傳員在八七水災的救災任務上，更需要善用黨國組織，承擔吃重任務。根據國民黨中常會上的「本黨各級組織救災工作簡報」，我們可以得知：黨中央不僅點名各級黨部婦工組要負責同志會議，非處災區的全國婦女黨工也同樣需投入捐募與救災活動。此外，臺灣區產業、公路、郵政、電信、鐵路等產職業黨部的婦工組織，乃至於婦女互助會等外圍組織也全受召喚，組織這些女員工們展開募款。

同樣地，大專院校也不例外，第一、第二知青黨部負責動員臺大與臺灣師大二校的在學女生投入捐募行列。位居國

166 行政院編，《八七水災重建實況》（臺北：行政院，1960），頁 1。

167 〈為救濟中南部災胞 各地展開捐助運動〉，《公論報》（臺北），1959 年 8 月 12 日，第 3 版。

家中樞的臺北市黨部則透過市內各區婦女會與戰時工作隊向家家戶戶募捐、協助中南部；而其他縣市黨部則是依賴「各縣市婦女義務幹事、宣傳員全面展開捐募衣物運動及協助婦女恢復家庭事宜」。[168] 同樣地，臺灣省黨部也授權各地民眾服務站得以視情況「組織婦女災區服務隊解決婦女兒童之困難」，由婦女承擔婦孺的照護角色。[169]

圖 7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救助八七水災勸募廣播車照片 [170]

從救災動員可見，婦工會展現遍布全臺的組織效能與動員力。身為基層主力的婦女義務幹事與宣傳員則在災情中迅

[168] 「第八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 155 次會議紀錄（1959 年 8 月 19 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國民黨〉，檔號會 8.3/155。

[169] 「台灣省委員會協助辦理『八七』水災工作報告（1959 年 11 月）」，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國民黨〉，檔號一般 576/208。

[170]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圖書文獻類〉，登錄號 2010.006.0058.0173（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速投入救援與募捐，成爲全國各級黨部不可或缺的人力。她們兼負家庭復員、安置與慈善等任務，並以母性化的性別形象被理所當然地包裹入政治勞動中。在「救災視同作戰」的情境下，這種無償奉獻替國民黨解決基層人力與經費的長期困境，也顯示黨國婦女工作以性別爲資源的運作邏輯。此情況再度凸顯婦工會作爲連結政治宣傳與社會服務的雙重特色，也凸顯國民黨在掌控臺灣基層時對這些婦女義工們的高度依賴。

值得注意的是，就婦女界整合上，三大婦女團體也同步在中央與地方受各級黨部婦工單位的號召，展現不分省籍、團結勸募的婦女工作。就地方而言，以高雄縣爲例，根據《臺灣黨務》上的黨工投稿，在該縣黨部婦工組長王傑超（1920-）主持下，成立勸募救災委員會，並由縣婦女會爲主委、縣婦聯分會爲副主委、縣婦工組爲總幹事，領導某軍團婦聯分會、陸軍官校婦聯分會、鳳山婦女會等三大婦女組織的當地分會，組隊至縣治鳳山挨家挨戶募捐，而後以此網絡模式擴展至縣內各鄉鎮。[171]

若從中央層級的合作觀察，相比於婦工會體系在勸募工作與政黨宣傳的表現，婦聯會則以勞軍爲本，且因深受宋美齡倚重，長期獲得國際援助與僑胞捐贈物資之支持，得以在災後迅速整理庫存衣物，並透過其設於三軍各部隊之分會體系，及時發放予受災軍眷。此一運作機制再度顯示，婦聯會不僅累積勞軍工作的專業經驗，其爲民間組織所具備的行政彈性與動員效率，亦與宋美齡所連結之海外資源網絡相互支

171 高錦書，〈高縣婦女冒雨勸募〉，《臺灣黨務》（臺中），期 207-209 合刊（1959 年 9 月），頁 68。

撐，形成與婦工會共同推動工作的優勢。[172]

由此可見，不僅中央與地方婦工組與自家黨內各單位並肩作戰，也展現其爲黨國婦女界的領導地位，熟悉地與其他婦女組織合作，將婦女動員力量推至極致，垂直與水平網絡綿密，當然能做到如前述高雄縣婦工組黨工所稱「發揮了最大的潛力」。[173]

八七水災引發海內外傳媒關注，國民黨政府也積極透過救災對島內與海外進行宣傳，其中對內宣傳主力不外乎強調政府救災的主動與積極，提供協助的美援反而淪爲配角。[174]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救災工程中，新聞管制與宣傳口徑上除了由各報社合訂「處理救災言論方針」，釐定採訪規定與言論指導外，亦指派「婦女宣傳網協助進行各種宣傳工作」，如同其平時業務般，發揮在基層宣導政令的本事：

> 由婦工會擬發宣傳資料指導婦女宣傳員進行基層及家庭宣傳，以宣揚政府救災能力，互民互濟精神及軍隊愛民之表現，倡導「解衣推食救災第一」為其工作之中心，在家家戶戶進行政令宣導。[175]

婦女義務幹事與宣傳員邊界雖總是模糊，但在此狀況下，更能獨見婦女宣傳員與其宣傳網的宣傳本業與工作方式。她們按照受訓內容與平時經驗，接受上級婦工會的指導資料（即

---

172 綠蔭，〈救災簡報〉，《中華婦女》（臺北），卷 10 期 1（1959 年 9 月），頁 3。

173 高錦書，〈高縣婦女冒雨勸募〉，《臺灣黨務》，期 207-209 合刊，頁 68。

174 游琇茹，〈美援對臺灣的災害救援——以八七水災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9），頁 61。

175 「第八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 155 次會議紀錄（1959 年 8 月 19 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國民黨〉，檔號會 8.3/155。

宣傳網指示），並且穿梭於家家戶戶間布達政令，當然也包含替國民黨美化政績。因此，此次救災體現婦女宣傳網廣布臺灣各地，自然必須與本土社會共生共存，這些本就出身各地的女性義工們平時爲中央在地方供應服務、爭取支持；而當天災發生時，也同樣隨即奉命調度，肩負政黨工作與家園修復的雙重責任，不斷地複製婦女宣傳與社區服務形影不離的工作模式。

最後，無論締造戰後臺灣的婦女票文化，抑或「八七水災」救災行動與賑災募款，抑或更貼近社區婦女需求的語言、家政與衛教課程，這些常態性與突發性的成果，都離不開這些婦女宣傳網與宣傳員的基層勞動與志願熱血：無論是鼓勵女性珍視投票權，或在選舉期間爲黨催票，抑或協助政府救災與賑災，她們的工作場域始終扎根於臺灣的地方社會，並務實地親近普羅婦女的日常生活。

換言之，婦女宣傳網作爲國民黨中央與臺灣基層之間的關鍵中介，替黨國體制先進地鋪平控制全臺基層民眾的滲透路徑，同時也替不同階級與族群的婦女們提供自立或互助的服務機會，時刻形塑著臺灣社會與政治的性別面貌。

結論

自 1980 年代以來，有關 1950 年代臺灣婦女宣傳工作的研究多重於婦女組織的宣傳成果與政治論述，較少關注其制度運作與在地實踐。同樣地，在探討黨國體制與臺灣社會的相關研究中，婦女工作的制度角色亦往往未受充分重視。爲補充此一研究缺口，本文以「婦女宣傳網」爲核心，從組織

建構與空間運作出發，分析國民黨如何透過婦女工作推動宣傳在地化，以及女性菁英在黨國與父權結構中的策略回應。本文亦試圖揭示婦女宣傳工作的基層網絡不僅是政治滲透的機制，也是性別角色與地方互動的歷史場域，有助於我們重新觀察國民黨動員體制深入社區家庭的在地化路徑。[176]

綜觀 1950 年代婦工會的建立與運作，其發展得力於黨國體制的支持與網絡，卻長期受制於政治權力與父權結構，導致經費與人力捉襟見肘。然而，中央與地方婦工單位內的女性菁英並未因此退卻，她們靈活運用有限資源與人脈，在制度縫隙中展現團結感、能動性與創造力。婦女義務幹事與婦女宣傳網的建立，既顯示國民黨以女性無償勞動支撐基層宣傳的剝削現實，也凸顯這群女性們在政治服從與自我突破之間的策略與智慧，及其在掌握專業、自我實踐上與無奈現實的交涉歷程。

建立於 1950 年代的婦女宣傳網，其政策思維與美國冷戰時期「家庭／國內圍堵」（domestic containment）的宣傳取向不僅隔空呼應，亦能視爲其在戰後臺灣社會的一種地方化實踐。它不僅是戰後國民黨結合國際冷戰論述與國內反共宣傳的產物，也延續戰前東亞社會深植已久的性別想像與父權框架，交織並徵用 1945 年前中國與臺灣婦女各自的戰時

---

176 比較而言，研究臺灣文學的學者們已從 1950 年代女性作家以生活經驗為基礎的書寫，觀察到外省或臺籍女性相對於男作家而言，與臺灣地方社會產生更早且更深的空間聯繫。相關研究可見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 15；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310-311；梅家玲，《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台灣小說論》（臺北：麥田出版，2004），頁 22-25。

後方與社區動員經驗。[177] 這套以「女性特質」為基礎的動員模式，彰顯女性長期被定位為情感勸諭與道德倫理的傳遞者，以及戰地後方與家庭建設的主持人。這有助於她們為當局穿梭社區、鞏固家庭，親切自然地博取地方信任，更便利推銷政治理念。

不過，婦女宣傳網一如國民黨所輕忽的婦女工作，黨政高層的男性菁英介入甚少，排擠居多，因此從宣傳綱要、各種教材，乃至於實行與考核，端賴各地女性菁英們有效組織、志願應援，終使黨國核心內唯一女性陣容的邊緣組織，透過統合族群、階級與地域的不同女性，以及上下連貫的宣傳政策，逐步轉變為國民黨政治宣傳深入婦女群體與基層家庭的關鍵媒介，催生 1950 年代黨國扎根臺灣、草根動員的另類模式。

同時，婦女宣傳網搭配義務幹事制度，善盡「宣傳到家」的口號與職責，將婦女的情感連結、身體展演與家務形象轉化為政治資本，使政治理念得以融入各地女性菁英的社區服務，並親民地浸透日常生活，推動政黨宣傳的在地化進程。對這群婦女宣傳員而言，在完成系統性的政治課程與工作實習後，透過服務民眾並運用所學與個人創意，藉歌舞、戲劇與臺語演出以及家政等實用知識的教學，使黨國僵硬的政治訴求以生活化的方式滲入鄉土，普及反共主義與選舉訴求。

然而，此「以服務代替宣傳」的柔性策略，高度偏重女性義工，反而低估女性專業與勞動價值，強化她們服務家園

177 學者林果顯曾指出：臺灣人在中日戰爭累積的動員經驗，使戰後國民黨得以在臺順勢延續戰時氛圍並強化反攻體制。請見林果顯，〈一九五〇年代反攻大陸宣傳體制的形成〉，頁 21-58。

與情感表演的政治責任與性別形象，更利用她們兼具觀賞性與宣傳力的身體與聲音，成爲吸引民眾接受政治宣傳的利器，實則強化黨國體制與父權社會的刻板想像。

無可否認地，婦女宣傳員在鞏固婦女的家務責任與政黨認同時，也在知能輔導、家政衛教、濟弱扶傾與社區女性互助網的形成上裨益良多，拓展菁英女性的公共空間與職涯規畫，也改善弱勢女性的生存處境。尤其，宣傳網推介女性政見或黨籍女性候選人，雖成效有限，卻也反映類似 1990 年代臺灣流行的競選口號「女人選女人」的粗淺嘗試，[178] 一定程度地啓蒙女性選民的政治意識，也培養民選公職女性的從政經驗。[179]

就實際應用案例而言，婦女宣傳網積極在地方選舉時參與在地的輔選工作與助選宣傳，並在八七水災時肩負政令宣傳與募捐工作，使我們更能看見這群女性工作者兼顧社會服務與政黨宣傳的工作本質。她們鞏固黨意深厚且不公平的「婦女票」選舉優勢，也爲國民黨政績擦脂抹粉；但同時在

---

178 「女人選女人」在 1990 年代前即由不同女性候選人零星地引為宣傳口號，直到 1994 年省市長暨省市議員選舉時，婦女新知協會方正式訂其為全國性的競選口號，並聯合多個婦女團體催票，支持女性候選人，一度風行傳媒。參考自顧燕翎，《台灣婦女運動：爭取性別平等的漫漫長路》（臺北：貓頭鷹出版，2020），頁 187-188。

179 學者黃長玲（Huang Chang-ling）提到：儘管婦女保障名額與各項鼓勵措施確實有益女性參政，但實情並不樂觀。隨著臺灣女性教育程度與政治實力節節高升，保障名額逐漸不敷使用，但政黨只願滿足最低法定名額而不願多提名女性候選人，反而另類地成為政黨交差了事的玻璃天花板。因此，「女人選女人」之風在黨國時代不可能發生，甚至連在 1990 年代亦難成氣候。請見 Huang Chang-ling, “Strength in Numbers: Increasing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p. 284.〈社運團體忙著動員〉，《聯合報》，1995 年 11 月 27 日，第 6 版。

提升婦女參政權與賑災上，迅速媒合工作經驗與人際網絡，做出實質貢獻。可見，婦女宣傳網在落實國民黨在地化的政策任務時，也與全臺基層建立密切紐帶。

因此，相對於非婦女宣傳工作者常重複僵硬的反共敘事、融入本地群眾意願有限，她們具體而鮮明的女性認同穿透階級與族群的隔膜，並務實地爲國民黨安定復興基地。她們在扎根地方後與本土社會共生共存，對臺灣的政治文化與性別觀有其影響。1959 年婦工會推動「幸福家庭運動」引發廣泛回響，即可視爲前述動員邏輯的制度化延伸。該運動以家庭秩序與婦女角色爲核心敘事，進一步將婦工體系長期經營的服務與宣傳工作整合與強化，顯示黨國體制已能透過婦女宣傳網將政治理念在地化，並實踐於基層社會的日常生活之中。[180]

此外，由於婦工會內的檔案並不公開，本文對婦女宣傳網重建多須依賴其他黨務文書間接推敲。另一方面，筆者尚未取得宣傳員本人與被宣傳者的口述史料，使在理解他們的工作經驗、公私生活與主體感受上仍存明顯不足。現有材料多爲制度文件、旁人記述及她們經審查後刊出的零散投稿，難以完全反映當事人視角，亦難辨析宣傳員的內部差異。此爲本文的主要限制，亦期待後續研究有機會進一步補強與深化。

整體而言，婦女宣傳網的誕生與發展是黨國體制、父權

---

180 關於 1959 年「幸福家庭運動」的性別論述，請見游鑑明，〈是為黨國抑或是婦女？1950 年代的《婦友》月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9，頁 110-119；陳佩甄，《冷戰的感覺結構》，頁 101-131。關於該運動之推動情形與歷史變遷，亦可參見藍暄侑，〈1950 年代臺灣婦女宣傳工作〉，頁 142-161。相關議題尚待進一步專文討論。

社會與女性現實生活三重交織的產物。國民黨宣傳與在地父權結構相互補強，並政治化地動員女性的私人情感與家庭角色。本文認爲，婦女宣傳網固然在黨內具邊緣性格與資源弱勢，但婦女在順從與策略性運用體制之間調適自身位置，使其不僅僅是政治宣傳與社區連結的重要中介，也藉機拓展社交與扭轉個人處境的可能，展現一定程度的能動性與主體性。

　　這種以女性特質與家庭形象爲核心的政治策略，促進臺灣基層社會的整合與進步，但也在某種程度上抹除女性群體的多元性，使性別分工更趨保守與僵化。從歷史脈絡觀之，婦女宣傳網所展現的政治動員模式，不僅反映冷戰時期性別政治的治理邏輯，也提供我們認識戰後臺灣婦女公共參與及性別秩序的重要線索。

徵引書目

一、檔案

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號會 7.0/10、會 7.1/78、會 7.1/94、會 7.3/654。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 002-080300-00021-010。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國民黨〉，檔號一般 576/208、會 7.4/5、會 7.4/127、會 7.4/130、會 7.4/232、會 7.4/234、會 8.3/155、會 8.3/312、會 8.4/4、會 8.4/14。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圖書文獻類〉，登錄號 2010.006.0058.0173。

「附件、中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第三十次幹事委員第十二次委員聯席會議紀錄」，1957 年 4 月 29 日，影印本。

二、報刊

《中央日報》（臺北），1959。

《中華婦女》（臺北），1959。

《公論報》（臺北），1959。

《婦友》（臺北），1956-1969。

《臺灣黨務》（臺北），1954-1959。

《臺灣黨務》（臺中），1959。

《聯合晚報》（臺北），2011。

《聯合報》（臺北），1959、1974、1995。

三、專書

（一）中文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印，《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四十五年度上半年工作檢討結論》。印行地不詳：印行年不詳。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央委員會四十三年年終工作檢討報告》。臺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54。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央委員會各處組會四十二年度工作檢討報告》。臺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印行年不詳。

中央委員會設計考核委員會編，《中央委員會各單位五十一年度中心任務執行情形檢查報告表》。臺北：中央委員會設計考核委員會，1962。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工作幹部手冊》。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56。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女黨員集訓教材》。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58。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黨務工作中婦女工作的重要性》。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58。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婦工十年》。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63。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重要工作報告》。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63。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我們的工作》。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76。

中央婦女工作會編，《蔣夫人言論選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0。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編，《區級幹部分區講習研討資料》。出

版地不詳：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1966。
中興山莊編，《基層黨務工作的方法》（臺北：中興山莊，1962），頁 134-135。
皮以書，《中國婦女運動》。臺北：婦聯畫刊社，1973。
任育德，《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新北：稻鄉出版社，2008。
行政院編，《八七水災重建實況》。臺北：行政院，1960。
李筱峯，《臺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臺北：自立晚報，1993。
周敏，《周阿姨的故事：走過歷史現場：1937-2011》。臺北：商周出版，2011。
柯惠鈴，《她來了：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激越時代的婦女與革命，1920-1930》。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
洪宜嫃，《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臺北：國史館，2010。
洪郁如著，吳佩珍、吳亦昕譯，《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新自然主義，2004。
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麥田出版，2002。
秘書處計畫檢查室編，《中央委員會各單位四十五年度中心工作報告表》。出版地不詳：秘書處計畫檢查室，印行年不詳。
高雄市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高雄市委員會七十九年度工作計劃》。高雄：高雄市委員會，1989。
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七輯。新北：國史館，1998。
婦友社編，《自由中國的婦女》。臺北：婦友社，1957。

梅家玲，《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台灣小說論》。臺北：麥田出版，2004。
陳佩甄，《冷戰的感覺結構：台韓文學與文化中的性別與情感政治（1950-1980）》。臺北：政大出版社，2024。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彭瑞金總編輯，《蘇澳鎮志》。蘇澳：蘇澳鎮公所，2014。
曾祥和口述，沈懷玉、游鑑明訪問，周維朋記錄，《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
游鑑明，《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2。
黃仁姿，《國民黨政權與地方菁英：1950 年代的農會改組》。臺北：國史館，2011。
詹碧霞，《買票懺悔錄》。臺北：商周出版，1999。
趙文藝，《婦女黨員組訓技術》。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54。
劉維開，《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務工作報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7。
錢劍秋，《經驗的歷程：致婦工同志的六十封信》。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61。
錢劍秋，《戰地黨的婦女工作講述綱要》。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65。
錢劍秋，《貫徹本黨政策　做我們應做的工作》。臺北：中央婦女工作會，1981。
薛人仰口述，遲景德、歐素瑛訪問，《薛人仰先生訪談錄》。新北：國史館，1996。
薛化元，《臺灣開發史》。臺北：三民書局，2022。
顧燕翎，《台灣婦女運動：爭取性別平等的漫漫長路》。臺北：

貓頭鷹出版，2020。

（二）西文

Cucuz, Diana. *Winning Women's Hearts and Minds: Selling Cold War Culture in the US and the USSR*. Toronto, Buffalo &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23.

May, Elaine Tyler.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四、論文

（一）中文

王文漪，〈十年煎熬〉，收入陳紀瀅編，《十年》。新北：文壇社，1960，頁 72-75。

王文漪口述，樸月專訪，〈幽蘭勁竹寫平生：訪王文漪先生〉，《文訊》，期 30， 1987 年 6 月，頁 176-187。

王張銘心口述，游鑑明訪問，黃銘明紀錄，〈王張銘心女士訪問紀錄〉，收入《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61-114。

任育德，〈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5 年 2 月。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輔選動員機制之建立及其發展（1950-196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25，2006 年 5 月，頁 71-116。

余文秀口述，游鑑明訪問，陳千惠、張成瑋、游鑑明紀錄，〈余

文秀女士訪問紀錄〉，收入《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115-152。
余敏玲，〈導論：同中有異的兩岸黨國體制〉，收入余敏玲主編，《兩岸分治：學術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1945-200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 1-29。
吳雅琪，〈臺灣婦女團體的長青樹：臺灣省婦女會（1946-2001）〉。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7 月。
呂芳上，〈抗戰時期中國的婦運工作〉，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一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 378-412。
林果顯，〈戰後台灣的戰時體制（1947-1991）〉，《臺灣風物》，卷 58 期 3，2008 年 6 月，頁 135-165。
林果顯，〈一九五〇年代反攻大陸宣傳體制的形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 年 4 月。
林蔡素女口述，游鑑明主訪，吳美慧紀錄，〈林蔡素女女士訪問紀錄〉，收入《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 121-174。
胡梅英，〈感恩與期望〉，收入謝鴻儀總編，《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一甲子年史》。臺中：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2000，頁 258-265。
張毓芬，〈女人與國家：臺灣婦女運動史的再思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 7 月。
許芳庭，〈戰後台灣婦女運動與女性論述之研究（1945-1972）〉。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1 月。
郭佳臻，〈動員女性選民：嘉義縣姊妹連線的個案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2024 年 7 月。

陳石滿口述，游鑑明主訪，黃銘明紀錄，〈陳石滿女士訪問紀錄〉，收入《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 217-252。

曾令毅，〈婦女團體抑或「附隨組織」：婦聯會與國民黨相互關係之探析〉，《黨產研究》，期 2，2018 年 3 月，頁 87-125。

游琇茹，〈美援對臺灣的災害救援——以八七水災爲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9 年 7 月。

游鑑明，〈臺灣地區的婦運〉，收入陳三井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2000，頁 403-554。

游鑑明，〈當外省人遇到台灣女性：戰後台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7，2005 年 3 月，頁 165-224。

游鑑明，〈是爲黨國抑或是婦女？1950 年代的《婦友》月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9，2011 年 12 月，頁 75-130。

游鑑明，〈國民黨走向家庭：婦女之家的社會服務（1956-1998）〉，《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7，2016 年 6 月，頁 191-264。

鄭維鈞，〈婦運脈絡下看政黨外圍婦女組織的限制與突破——以民進黨水噹噹助選團爲例〉。臺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1 月。

賴月桂口述，曾文亮訪問，吳美慧、李思儀紀錄，〈賴月桂女士訪問紀錄〉，收入《百年回眸：臺北第三高女校友口述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3，頁 157-188。

錢劍秋，〈國民黨婦女政策及婦女工作之研究〉，收入三民主義研究論文集編纂委員會編，《三民主義研究論文集》。臺北：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1965，頁 1022-1031。

薛化元，〈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再評價——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

的比較〉，《臺灣風物》，卷 68 期 4，2018 年 12 月，頁 167-204。

藍暄侑，〈1950 年代臺灣婦女宣傳工作〉。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 年 7 月。

（二）西文

Gold, Thomas B. "Retrocession and Authoritarian KMT Rule (1945-1986)." In Gunter Schubert,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Taiwa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36-50.

Huang, Chang-ling. "Strength in Numbers: Increasing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In Wei-hung Lin and Hsiao-Chin Hsieh, eds., *Gender, Culture & Society: Women's Studies in Taiwan*. Seoul: Ewha Woma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73-299.

Party Propaganda and Women's Service: Institutional Operations and Local Practices of the Women's Propaganda Network in 1950s Taiwan

Lan Syuan-You *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the Women's Propaganda Network 婦女宣傳網 established by the Kuomintang （KMT） Women's Working Committee in 1950s Taiwan, analyzing its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local operation within the broader structures of the party-state and patriarchal society. Drawing on party archives, newspapers, grassroots contributions—namely written submissions ,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and oral histories, the study reconstructs how the network translated anti-communist propaganda into domestic routines and community services. Under limited resources, it relied on local women's voluntary labor, personal networks, bodily presentation, and maternal authority to disseminate political messages in everyday setting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etwork functioned

* University History and Archives Sec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both as an instrument of party-state penetration and as a channel for women's entry into civic life. Cases such as local elections and the August 7 Floods （八七水災） of 1959 reveal how it consolidated KMT grassroots support while reinforcing gendered expectations of unpaid service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emergence of a "women's vote." The network thus illuminates the localized and gendered modalities of Cold War mobilization in Taiwan.

Keywords: KMT Women's Working Committee, Women's Propaganda Network, voluntary women cadres, political propaganda, community service